



## 中评周刊 | 第 81 期目录

### 专题 | 中国外交以谁为友，纳税人的钱怎么花

1. 张曙光: 从“孟母三迁”看中国的国际战略——为“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而作 P. 2
2. 唐丽霞: 如何理解中国的对外援助 P. 4
3. 舒云: 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 P. 10
4. 吴荣堂: 惊叹中国曾经对越南的忘我援助 P. 18
5. 托马斯·卡罗瑟斯: 中国与对外援助 P. 22
6. 颜昌海: 毛泽东为何要援助阿尔巴尼亚 9 千亿元? P. 27

### 观点文章

1. 盛洪: 政府份额膨胀，利润空间殆尽 P. 34
2. 资中筠: 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纳粹“成功”建造的两根柱子 P. 43
3. 胡德平: 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 P. 53

### 随笔散记

1. 张曙光: 余老师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P. 56
2. 余大章先生 追思会纪要 P. 59
3. 颜昌海: 没有中国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 P. 66

### 读书

- 刘瑜: 《公正》书评 (虽然是书评，但是很现实，不看原书无所谓) P.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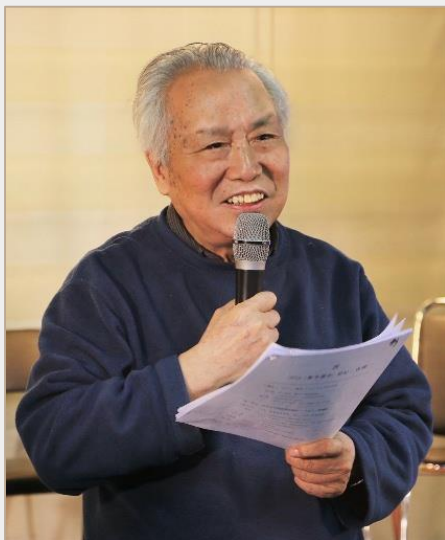
###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4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76

## 张曙光：从“孟母三迁”看中国的国际战略——为“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而作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 图片来源：中评网

现在提倡国学，大家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少时，家住在坟墓附近，他就嬉戏墓间筑埋之事。孟母认为，“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随举家搬迁，一迁近于市，二徙近于屠，皆以为不妥，第三次迁徙至学宫之傍，孟子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处居子矣”，遂长居于此。等到孟子长大，读诗书，学六艺，成为大儒，世称亚圣。可见孟母眼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决策之明智。

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学习和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真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因为，迁徙的本质是选择，国家不能像个人那样迁徙，但可以选择。实际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选择与谁结友，与谁为伍，与谁同行。这是历史的大道理，而非小孩子的过家家。

共和国70年的历史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见证。从1949-1978年，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其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是反复折腾，几度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子，政权的合法性也发生动摇。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他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道路和主要经验。



孟母三迁 光绪末年 李扬声 作 1908 年

讲到这里，应当提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尽管在他们当政的时候，也有过很多决策失误，邓小平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仍不愧是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1972 年，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改变了他亲定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打开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的大门。继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尽管对他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尚存有争议，但此举包含战略和政策转向的意义和信息是明显的。西方政治家看懂了这一点，双方相互配合，才有了 1978 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50 人论坛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包括其与美国经济学家的对话。

从目前来看，关于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主有次，有重有轻，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须一把抓。积 40 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寸利必争，分毫不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也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

2018/09/16, 于北京

[【返回目录】](#)

## 唐丽霞：如何理解中国的对外援助

[唐丽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管理学博士、德国洪堡大学农学和园艺学院农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09-05 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唐丽霞

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称，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向全球 140 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贷款，累计金额高达 3620 亿美元，约 2.4 万亿元人民币。该文主要援引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援助数据”项目 (AidData) 一个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信息，来展示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庞大。和以前历次出现的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新闻一样，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评论，很多人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就是到处撒钱”。

那么，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到底多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

中国政府曾经于 2011 年和 2014 年两次发布有关对外援助的白皮书，非常明确地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类型和规模。

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主要有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据两个白皮书的数据累加，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总额为 1385.2 亿元，无息贷款资金为 838 亿元，优惠贷款援助资金总额为 1233.1 亿元，合计为 3456.3 亿元人民币。

从两份白皮书公布的内容来看，我国对外援助的资金类型和结构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基本上保持口径一致。西方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也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赠款，也就是无偿援助；一类是优惠贷款，但优惠贷款必须要有 25% 的赠款成分，才能被称为是官方发展援助。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优惠贷款是指由我国银行提供的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发

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我国政府提供的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利率为 4%至 5%，贷款的偿还期为 5 至 15 年，一般为 8 至 10 年。时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国际部总经理朱稳根在 199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衡量贷款的综合指标“赠与成分”来计算，中国优惠贷款的赠与成分仅有 25%，刚刚达到 OECD 关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最低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优惠贷款具有援助性质。

但原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人员陈力在 199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和其他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相比，1993 年，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平均贷款利率为 2.7%，平均偿还期为 27 年，宽限期为 10 年，赠与成分平均达到 57.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优惠贷款的援助程度相对较低，更像是具有优惠性的经济合作。

上引研究结论虽然出自二十多年前，但国际官方援助本身的定义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增加了其他援助方式和援助筹资类型，所以仍然可以用来评价当下的国际援助。

在财政部的财政统计中，每年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中有有关对外援助的支出金额。按照这个统计，中国每年提供的对外援助规模的确呈上升趋势，从 2007 年 111.54 亿元上升到 2015 年的最高值 195.37 亿元，2016 年出现了明显降幅，2017 年又开始回升，对外援助支出为 168.7 亿元。将此数据和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公布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推断，这里提到的我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应该主要是赠款和优惠贷款的贴息。（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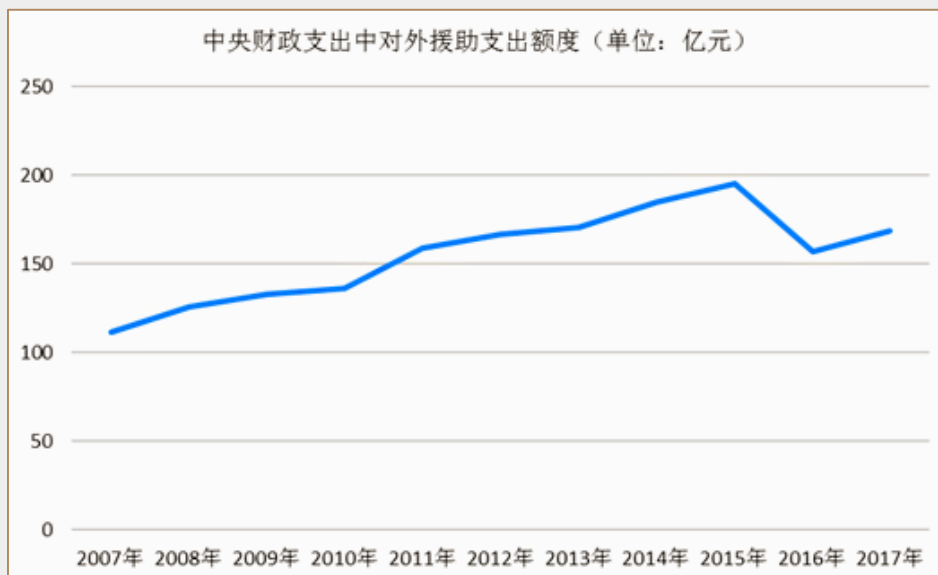


图 1：中央财政对外援助支出（单位：亿元）。资料来源：财政部预算司的中央财政支持表

## 二、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太多了

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太多，这是一个很难直接回答的问题。这里，笔者通过几组数据比较来讨论中国是否真的提供了太多的对外援助。

首先，从对外援助总额上来看，根据现有的公开数据，2010 至 2012 年，中国对外援助中无偿援

助为 323.3 亿元，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统称为优惠贷款）额度为 570.2 亿元，按照当时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率 6.6 来计算，也就是无偿援助 48.98 亿美元，优惠贷款 86.39 亿美元，合计约为 135.37 亿美元。而根据 OECD 的统计，同一时期内，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约为 942 亿美元，英国约为 418 亿美元，日本为 578 亿美元，德国为 445 亿美元，法国为 424 亿美元。

其次，从对外援助的结构上来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对外援助几乎全部都是无偿援助。德国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占到 83.90%。德国复兴开发银行 (KfW) 负责财政援助，其负责人表示，对低收入国家，德国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财政援助是无偿的。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比较多地采用优惠贷款援助方式，但优惠贷款援助的比重只占到 40.57%和 31.64%，远远低于中国的 63.82%。

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不仅总额要远远低于一些重要的传统发达国家，其中无偿援助所占比重更低。（参见表 1）

国家	援助总额	无偿援助		优惠贷款	
		总额	比重	总额	比重
澳大利亚	143.23	141.86	99.04%	1.37	0.96%
加拿大	164.66	164.66	100.00%	0	0.00%
法国	423.67	314.01	74.12%	109.66	25.88%
德国	445.52	373.79	83.90%	71.73	16.10%
意大利	106.43	103.20	96.97%	3.23	3.03%
日本	577.74	343.34	59.43%	234.40	40.57%
韩国	42.22	28.86	68.36%	13.36	31.64%
英国	418.41	403.19	96.36%	15.22	3.64%
美国	942.13	942.13	100.00%	0	0.00%
以色列	5.32	5.32	100.00%	0	0.00%
俄罗斯	14.16	14.16	100.00%	0	0.00%
沙特阿拉伯	101.7	92.04	90.50%	9.66	9.50%
泰国	1.11	0.77	69.37%	0.34	30.63%
土耳其	47.74	42.74	89.53%	5.00	10.47%
阿联酋	21.92	18.43	84.08%	3.49	15.92%
巴西	20.26	20.26	100.00%	0	0.00%
中国	135.37	48.98	36.18%	86.39	63.82%

表 1：2010-2012 年部分国家对外援助总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中国数据来自于白皮书，巴西数据来自于巴西国际发展署。

注：OECD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是将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援助总额相加获得，故而本处数字和该数据库中直接提供的援助总额略有差异

上个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发展大会提出，发达国家应拿出 0.7%的国民总收入（GNI）用于发展援助，这个目标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履行国际发展援助义务的程度度的一个标尺。传统的发展援助体中，丹麦、卢森堡、荷兰、瑞典、挪威基本上一直保持在 0.7%以上。这几年，德国和英国提高了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英国从 2013 年就一直保持在 0.7%，德国在 2016 年也达到了 0.7%的水平。美国一直保持在 0.18%至 0.2%，日本也达到 0.2%，韩国保持在 0.14%左右。传统发达国家

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0.3%，而中国目前对外援助仅占国民总收入的 0.062%左右。  
(参见表 2)

国家	ODA/GNI	国家	ODA/GNI	国家	ODA/GNI
DAC成员国	0.3	匈牙利	0.1	斯洛文尼亚	0.13
澳大利亚	0.34	冰岛	0.22	西班牙	0.29
奥地利	0.29	爱尔兰	0.5	瑞典	0.99
比利时	0.55	意大利	0.16	瑞士	0.44
加拿大	0.32	日本	0.18	英国	0.57
捷克	0.12	韩国	0.12	美国	0.2
丹麦	0.86	卢森堡	1.01	中国	0.0623
芬兰	0.54	荷兰	0.76	以色列	0.08
法国	0.47	新西兰	0.27	俄罗斯	0.03
德国	0.38	挪威	0.98	土耳其	0.21
希腊	0.15	波兰	0.09	阿联酋	0.19
葡萄牙	0.29	斯洛伐克	0.09	巴西	0.03

表 2：部分国家官方发展援助 (ODA) 占国民总收入 (GNI) 的比重 (%)

资料来源：OECD 统计数据，中国数据和巴西数据为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获得。

注：DAC，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设的发展援助委员会，

现有 29 个成员 (包括 28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欧盟)

中国一直坚持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对外援助。近些年，和中国一样，全球新兴经济体也逐渐加大了对援助的力度，从援助总额上来看，中国的确要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从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来看，中国对外援助程度要低于土耳其、阿联酋、以色列。如果考虑到对外援助的结构，其他国家对外援助主要为无偿援助，中国无偿援助占到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约只有 0.0225%，还要略低于巴西的 0.03%。

### 三、中国是否应该提供对外援助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改革对外援助开始，强调互利共赢是我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特点。抛开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对我国总体国际发展环境构建的积极影响不谈，单从我国优惠贷款的使用效果来看，互利共赢的特点尤为明显。

我国优惠贷款的使用条件是非常严格，支持的项目由中方企业负责承建，采购项目所需的设备等原则上应由中方企业负责供货，主要采购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这也是大家经常在海外看到中国援建项目主要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原因。近年来，也有一些国际公司或者受援国公司参与中国援建项目，但规模仍然十分有限。

因此，中国优惠贷款不仅为受援国提供了基础设施、生产性项目的发展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国内公司走出去，尤其是工程承包公司走出去奠定了基础。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 发布的 2017 年度全球工程承包商 250 强榜单显示，49 家中国建筑企业入围榜单；前 10 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了

7 个席位。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能够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和承建中国政府优惠贷款项目是密切相关的。

非洲是获得中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区域。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国际承包工程完成额一直占到中国国际承包工程完成额的三分之一左右，非洲是中国的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此外，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实施还带动了中国的装备和产品走出去，亚吉铁路（非洲第一条跨国标准轨现代电气化铁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和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该国港口城市蒙巴萨）带动了 44 亿美元的国产装备和产品出口。

一些企业因承建中国优惠贷款项目而在受援国积累了良好的声誉，逐渐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合同招标的有利竞争者，成为全球工程项目的主要承包商。有研究认为，从 2007 年到 2015 年，中国公司获得了世界银行 30% 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的合同。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为例，该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中，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项目大约只占到 30% 至 40%，来自世界银行和国外政府的项目大约占到 20% 至 30%。在非洲国家，处处可以看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的工程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融资建设，如该公司在纳米比亚先后完成的鲸湾新集装箱码头项目和油码头项目，合同承包额大约为 8 亿美元，都由当地政府投入资金。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屡屡获得国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合同，随之带出去的是中国的技术、标准、物资和设备，这也就带动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一些中国的中小型公司承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无偿援助的民生项目，也在当地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并逐渐发展成为能为国际发展援助项目提供工程服务的公司。如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下属股份制国企甘肃地质工程有限公司曾在赞比亚和马拉维实施中国无偿援助的打井项目，由于打井成本控制良好，效率高，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打井项目，就交给了该公司去执行。（参见表 3）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进口	932.40	1132.51	1174.55	1156.31	702.58	566.90	752.60
出口	730.83	853.11	927.99	1060.35	1085.41	922.72	947.40
贸易逆差	-201.57	-279.40	-246.55	-95.97	382.82	355.82	194.80

表 3：中国国际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非洲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产品的提供区域之一，中国三分之一的石油来自于非洲大陆，铝矿、铜矿、钴矿等矿石资源从非洲进口也占据非常大的份额。非洲同时也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从 2009 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部分年份，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逆差，但是从 2015 年开始，中国对非洲大陆贸易呈现出大额的顺差，2015 年顺差 382.82 亿美元，2016 年为 355.82 亿美元，2017 年为 194.80 亿美元。

在 2015 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对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包括 350 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贷款额度；为中非发展基

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 50 亿美元;设立首批资金为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项目。而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加起来只有 50 亿美元,这个额度远远低于中国和非洲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额。(参见表 4)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进口	932.40	1132.51	1174.55	1156.31	702.58	566.90	752.60
出口	730.83	853.11	927.99	1060.35	1085.41	922.72	947.40
贸易逆差	-201.57	-279.40	-246.55	-95.97	382.82	355.82	194.80

表 4: 中非贸易情况 (单位: 亿美元)。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援助规模和援助程度上看,中国对外提供援助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无论是与传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援助都不像国际和国内社会想象的那么多。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就是到处撒钱”,这样的论断是片面的,也是对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误解。

中国对外援助总是容易被夸大,引起国内外民众的误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通常在国际会议、论坛等多种机制上宣布对外援助举措和行动,有很多举措和行动是多次宣布,容易让民众以为每次都是新安排新计划。

第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式非常多,有很多不是对外援助,有些是具有发展意义的经济合作,但国内外媒体报道普遍使用了“支持”、“帮助”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这样的表述,容易造成国内民众误解。

以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例,第五届部长级会议(2012年)时,国内外媒体普遍采用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将向非洲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第六届部长级会议(2015年)时,国内外媒体报道侧重于强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但实际上,这 600 亿美元中,有 50 亿美元是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其他多为优惠性质贷款、出口信贷额度,以及产能合作基金等,多属经济合作范畴。但如果不是从事这方面专业研究的大众,是无法理解这里面的真正内涵,从而造成了误会。

第三,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实施方式和内容有关。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主要都是由中国企业来实施的,而西方援助项目,很多是国际公司来承担,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企业具体执行,容易造成只要是中国公司承建的都是中国援助的印象。中国的援外项目仍然是以能够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容易引起关注,而西方的援助则很大一部分是以看不见的能力建设为主,一般不太容易被民众感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是在逐年上升的,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日益增强。■

[【返回目录】](#)

## 舒云：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

[ 本文首发于 2009 年第 1 期《同舟共进》。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 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3 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 1950 年 7 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 年 11 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 40 个工种 12250 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 8200 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 年 8 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 100 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 7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 月 15 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 1500 吨至 2000 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 1950 年至 1954 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 1.67 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 年 3 月 13 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 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 年 5 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 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志愿军“抗美援朝”，付出国人生命代价的统计，

其中在战场上阵亡为 114084 人，因伤医治无效死亡为 21679 人，总计 136763 人；

失踪为 25621 人，除确认关进美军战俘营有 21400 余人外，尚有 4200 人左右失踪未回归，后估计已在战地死亡；

伤病员 13210 人医治无效死亡，

将阵亡、伤死、病死、失踪估计死亡人数相加，共计 153000 余人付出生命代价；

这是 2 年零 9 个月入朝战争中死亡的人员总数

1955 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 8 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 1955 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 3 万吨大米以及 300 吨面粉、5 吨葡萄干、1130 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 10 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 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 年 2 月 18 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 7 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 3 亿元的长期贷款和 1 亿元的无偿援助。

###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 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 1956 年 6 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 1956 年和 1957 年，无偿赠予 8 亿柬元（折合 800 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 年 10 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这些刚从别国的殖民地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非洲国家是跟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交还是跟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这都是需要我们用金元、用经援来加以影响的，这关系到我们大陆的邦交国的数量问题，关系到大陆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大小问题。——楼主评点）。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

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 2.1 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 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 69 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2 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 8 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 1961 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 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楼主附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 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 1979 年才恢复名誉。

###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 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 年 6 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 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 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 年 10 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 32 万人，最高年份高达 17 万人。1970 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 1442 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 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 7 笔，援助数额达 36.1 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 74.25 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 3.5% 上升到 5.1%。8 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 月 27 日，中越

两国政府签订 1972 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 27.98 亿元人民币。

1972 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 51.49 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6.7%，比 1971 年上升 31.6%，11 月 26 日，中越签订 1973 年中国对越南 13 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 21.07 亿元人民币。

1973 年中越签署 7 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 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 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 57.98 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 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 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 年 5 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 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 1976 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 1962 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 年前，中国生产的 63 式电台 3000 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 年 6 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 1969 年的援助，提出急需 107 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 年至 1972 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 1000 架飞机，3 个营的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 180 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 20 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 204 门，炮弹 4.5 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 1978 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 200 万陆海空军部队，各种物资折价 200 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 个成套设备项目，346 亿米棉布，3.5 万辆汽车，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多公里油管，6.35 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毛泽东那么英明为何却不做两手准备，以防将来越南有跟中国反目成仇、转而投靠苏联的可能？——楼主评点）。

###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 年 11 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 1960 年

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我国就每人交了3800元，这还不包括送给亚非拉其它100多个国家的。此文开头第二句讲了在1976年之前我国总共援助了110多个国家。——楼主评点）。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中国现在的电线杆仍然是水泥加钢筋条做的吧——楼主评点），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

[【返回目录】](#)

## 吴荣堂：惊叹中国曾经对越南的忘我援助

[本文首发于 2013-02-24 作者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中越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20年。笔者有幸参加过83年—87年两山轮战时期广西战区的对越战斗，记得部队在战前动员时，总是说小越南是忘恩负义！中国曾经在大饥荒时期对越进行了大量援助，那么到底当时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多少？翻开已解密的历史看看中国对越援助的真实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为了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联盟，体现中越“同志加兄弟”友谊，从1969年到1972年，中共与越南签订并执行了30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

在20多年间，中共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优秀的儿女在支援越南抗美的战场上，伤亡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给与越南的援助，胡志明说是“恩深、义重、情长”。

据统计，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的铁路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 and 6.35亿美元的现汇，援越物资总价值200亿美元。



1979年中越境冲突时，战士们发现越军用中国大米作掩体，越军用中国制造的武器打中国人，弹

药比中国军队还充足。用着中国的战术殒殒窃经为越军培训了许多指挥人才，与我们作战.....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共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共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共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七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中国铁道兵在越南，冒着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抢修铁路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对越南援助了大量 69 式 40 毫米火箭筒，  
并派大量高炮部队进入越南境内

1971 年至 1972 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 1000 架飞机，3 个营的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 180 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 20 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 204 门，炮弹 4.5 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截至 1978 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 200 万陆海空军，各种物资折价 200 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 个成套设备项目，346 亿米棉布，3.5 万辆汽车，500 多万吨粮食，200 多万吨汽油，3000 多公里油管，6.35 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对外援助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据统计，到 1978 年止，中国对越的援助总值达 200 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款占 93.3%，无息贷款占 6.7%。



援越时期声讨美国的宣传画

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拿出 200 亿支援越南的？毛 XX 说：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中越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同志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当时国家专门成立了以总理为总负责的领导机构，不顾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动员全国全民，倾尽全国之力援助越南，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 1979 对越开战前的 1978 年还在援助越南。

中越反目后，中共称越南是“忘恩负义”、“白眼狼”也不为过，但是，中国对越南的多情和厚望应该是愚蠢和天真的。希望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对越援助的闹剧将不再重演。 ❄

[【返回目录】](#)

## 托马斯·卡罗瑟斯：中国与对外援助

[ 托马斯·卡罗瑟斯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本文转载自 2013-07-15 中道网 ]



托马斯·卡罗瑟斯

托马斯·卡罗瑟斯在一次采访中借鉴其新着《当发展援助遭遇政治：几近革命》(Development Aid Confronts Politics: The Almost Revolution) (与戴安娜·德·格拉蒙 Diane de Gramont 合着)，发表了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援助参与者所起的作用、如何对当地正直做到既不选择性失明又不横加干涉、中国援助的动机、投资与援助的关系、中国援助和西方援助之间的竞争，以及专门针对中国援助提供者的具体情况提出的针对性建议。

### 中国在国际援助或国际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中国正在加强其对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世界各地有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在发展援助方面与日俱增的重要作用表示欢迎。贫穷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中国当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若中国真想帮助其他国家，就必须确保其所提供的发展援助不仅是为了交朋友。广交朋友乃是提供援助的应有之义，但诚心实意帮助友邦向积极方向转变，帮助其进一步改善民生也属不可或缺。有时，仅仅为了交友而提供援助与为了真正促使友邦的积极变化而为之之间存在着混淆。在中国正忙于与之进行交往的几个的非洲国家里——不论是在安哥拉、南非，还是在其他地方，中国将不得不面对该问题，以决定它到底想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种与多个政府业已建立起来的关系，成为推动积极发展变革的合作伙伴。

你在书中主张援助提供国应具有政治智慧，那么中国在政治上既不选择性失明又不进行干涉的同时，该怎样表现出政治智慧来呢？

援助总是带有“政治色彩”这一想法是见仁见智的事儿，所以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就很重要。

在提供发展援助时表现出政治智慧来，指的是了解当地的政治进程，同时确保所提供的发展援助与当地的政治现实相契合，真正成为促进积极变革的因素。不妨举例说明，假设你试图帮助某国政府加强教育，那就需要了解影响该国教育系统的政治因素，比如某政府因对该国某地区的个别族群怀有敌意，而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该地区的教育——如果你了解这类因素，就能更有效地提供帮助。

因此，表现出政治智慧是任何真正想要促进积极变革的发展参与者都应具备的素质。从根本上说，提供援助本就是一种干涉：外部参与者来到他国，带来了资金或技术，试图帮助这个国家进行变革。你并非刻意“干涉”，但却已置身于另一个社会中，成了试图协助改变这个国家的参与者。如果你这样做了，就有责任表现出智慧来，就需要知道该怎么做，需要了解你所提供的援助会以怎样的方式为该国民众所利用，同时对援助会产生哪些政治影响了然于胸。你也许会说：“我提供援助只是为了完善教育政策”，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强化了一个并不热衷于实施全民教育的政府。因此，你必须清楚地知道你所提供的援助所带来的更大影响是什么。如果你想成为负责任的发展援助参与者，就不能说：“我根本不关心政治”，或者“我们丝毫不会干涉政治”，这就是在政治上选择性失明，或者说是在政治上装聋作哑，这样万万不可。

单就“不干涉”这一概念而言，同样不够清楚明了。在本身既以改善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援助项目下，如协助加强一国立法机关，或者帮助健全法治，只有与该国政府合作才能实施。这种援助往往是该国政府要求提供的援助，并非干涉。因此，你正在努力完成的某项使命可能颇具政治色彩，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不过是与该国政府合作罢了。所以说，带有政治色彩和政治干涉可是两码事。

所谓政治干涉，指的是外国援助者怀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政治目的又是为受援助国某些重要群体所反对的。例如，某提供援助者来到一个国家，试图通过支持一方打压另一方的形式影响该国的选举结果，这就是属于政治干涉了。

### **应付当地存在的腐败问题，该表现出怎样的政治智慧呢？**

与腐败政府打交道是西方援助机构一直都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不仅是西方援助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援助国都会面临这一问题。自1990年代开始，援助提供国就开始面对该问题，并且自此一直在尝试设计一种不会助长腐败或腐败政府的援助方式。例如，某些西方援助机构的选择是，如果某些政府明显存在腐败，他们就不向其提供援助；或者尝试制定相关方案，帮助这类政府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这些措施都很不错，但减少腐败在任何地方都是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这也正是我们在书中提到的：提供援助需要通过对资源和权力实施更好的政治管理，以便服务于真正帮助受援国这一目的；这与那些对此类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只把援助当成是对某些友邦的奖赏，或者对发展持有非常狭隘的经济观点的援助行为截然不同。

### **你所主张的帮助受援国“进行积极变革”，并不一定是指“民主”变革，对吗？**

几乎所有西方援助机构都有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有的以民主制度为目标，但有的只采用“善治”或“仁政”的概念，而并不拘泥于民主。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改变其自身政治体系的根本类型的前提下提高其执政水平。因此，如果一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有效，更遵守法律规定，腐败现象不断减少，我们就可称之为更好的治理方式。协助达成这样的目标，从我们试图通过政治制度改变其行为方式、促使其改善与公民关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便可称之为政治援助。在西方援助界，问责制的概念已经发展完善并日益流行，因为大家意识到，“政府对人民负责”是一个无可厚非、四海皆准的标准，而具体实现“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制度则可不拘一格。对任何政府的行政人员来说，很难在意识形态上反对问责制，这实际上无异于说：“不，我不应该向我的公民负责。”我相信，任何负责任的官员，不管他来自中国、西方、还是非洲，在回答“我国政府应对本国公民负责吗”这类问题时，他们都会说“是的”。

下一个问题是，问责制的机制是什么？其中是否包括公民可通过选举否定那些表现不佳的行政官员？在一些国家，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关注并积极回应公民的关切这一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只要我们赞成治理问责制——这一几乎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详细探讨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以及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有助于孕育问责制等问题。

### **投资（如对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和援助可以并行不悖吗？**

许多援助提供国都有过在受援国扮演多重角色的经历，既是投资出资方，又是援助提供国，有时候投资是以援助的形式提供的，例如提供降息贷款。投资和援助有时可以并行不悖，有时则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冲突。有时，如果未对投资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或者投资接收方的施政条件进行深入思考就贸然投资，那么这项投资就可能对该国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扮演着投资国与援助国的双重角色，这就会导致问题的出现；同样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也曾遇到过，那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既是投资来源国又是援助提供国时遇到的老问题，因此在投资与援助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问题出现。但我认为中国会注意到，它越是试图将投资与援助结合得更紧密，它就越需要向投资者提出更棘手的问题，比如投资者起到什么作用、对当地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因为这有可能最终导致援助关系出现问题。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如赞比亚和缅甸，中国在当地的投资收到了一些负面的反响。

### **你是否觉察到中国的援助动机与西方的不同？**

西方援助国提供援助的动机多种多样。一般说来，主要是为了结交朋友或维系友谊，有时则是为了在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有的单纯为了行善，帮助他国发展。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多重动机，有时通过援助建立友谊，以确保获得自然资源；有时是为本国商品争取市场或打入当地经济。还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些穷国一旦变富，就会有更多的钱用来买中国商品，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出口市场增加了。当然，有时候利他主义也是中国对外援助动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使如此众多的人口摆脱

贫穷的国家，中国希望与外国分享这些经验。一些中国人抱有一种诚挚的情怀，他们为祖国实现帮助其他国家摆脱贫穷的愿望而感到骄傲。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援助行为的动机都是复杂的。只有少数政府，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援助国，多数政府都怀有一系列政治经济援助动机。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可能更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某些团结合作。它所处的经济地位有所不同。但说到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有着与其他主要大国相同的多种动机。

###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一个典范？**

每个提供援助的政府都会面对此类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典范。例如在美国，我们在政治资金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政治家受特殊财政利益的影响过大，并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筹款。但尽管存在这类问题，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施以援手，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降低或更好地调节金钱在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

你不需要做到十全十美才能帮助他人。事实上，如果你自身存在某些问题但努力改正它们，就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从你获得的经验教训中受益。因此，假如一个美国人去到非洲，说：“我们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我们了解了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难以解决”，他就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兴趣。成为援助国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无所不知，关键在于你真心希望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因此，不管是中国、美国、英国还是日本，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无缺的。问题在于，你是真心为了帮助他人而提供援助吗？你愿意承认自身的缺点吗？

### **有人谈到中国援助和西方援助之间的竞争，你认为存在竞争吗？你是否对此感到担心？**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就意识到，在获取资金或其他种类的资源或援助方面，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如今，他们有时会禁不住对西方援助者说：“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们了，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援助。”我认为，就本质而言这绝非坏事，它取决于所提供的援助的性质。一般来说，援助来源多是好事，因为那意味着对需要的人的更多的援助。而且，援助国之间存在某种竞争也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就迫使援助国提供更为有效的援助。如果竞争只在于出钱多的人能交到更多朋友，那这就不是健康的竞争了。因此，援助领域存在竞争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坏事，但需要再次声明，它取决于援助的意图。

正如我一开始就说到的，我和许多西方朋友一样，对中国在非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欢迎。但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才确保提供的援助发挥效用的。鉴于中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和困境，我希望中国也能像西方援助国一样，通过经年累月的学习摸索，使其援助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高效。

### **对中国的援助政策制定者和实际工作者，你有什么建议？**

我们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援助国必须对其打算援助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认真分析，以便充分了解该国如何获得援助、谁会利用这些援助、他们利用援助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援助对该国的

切实影响。如果你匆忙来到一个国家，在未对其政治现实、当地环境，以及这些援助对当地政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真正深入的考虑前便贸然援助的话，这就算不上是有益的援助。因此对援助国来说，开发有效的政治分析工具并妥善使用这些分析工具非常重要。

我们谈到的另一项原则，就是从单纯向政府提供援助过渡到同时向该国公民提供直接援助（通常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实现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将部分公民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甚或苛待部分公民。因此，在向一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同时，还要探寻向公民提供直接援助的途径，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一步很敏感，因为受援政府通常希望控制所有援助物，而不愿让援助直接落入某些公民团体手中。不过西方援助国已经认识到，平衡地向政府和公民提供援助可使援助国与受援国整个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还有助于受援社会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

[【返回目录】](#)

## 颜昌海：毛泽东为何要援助阿尔巴尼亚 9 千亿元？

[ 颜昌海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侨务系统创办《华风》月刊并任深圳侨报社常务副总编兼副社长，现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本文转载自 2011-11-16 作者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阿尔巴尼亚，现为北约组织成员国。2009 年 4 月 28 日阿尔巴尼亚正式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09 年底欧盟批准了阿尔巴尼亚的入盟申请。

宗教信仰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统治时期遭到官方查禁，当时阿尔巴尼亚宣称其为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无神论国家。阿尔巴尼亚还是世界人均碉堡最多的国家，有“碉堡王国”的“美称”。



1970 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无偿建造了可容纳 50 架战机的空军洞库基地，援助了 12 架歼-7 战斗机和 470 辆 59 式中型坦克等大量重型武器，以及我国最新最好的工农业机械设备、军用车辆等，以防范南斯拉夫对阿入侵

1960 年代初，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曾在政治上既反美又反苏，同时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邻国也存在历史宿怨或者领土纠纷，可说是国门之外，四望皆敌垒，令这个小小山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当时的领导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富有游击战经验的他们把中国的“深挖洞，广积粮”要诀略加变通，喊出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响亮口号，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全民动员建造碉堡。凡是去过阿尔巴尼亚的人，无不为其星罗棋布的碉堡而惊叹。在广袤的农村田野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排碉堡，公路两侧、山顶山腰、房前屋后，甚至度假沙滩上都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碉

堡。这些碉堡有明碉、有暗碉；有暗道密如蛛网、多达几十个一群的群碉，也有孑然兀立的独碉；有能藏兵数百、附设粮仓弹药库的指挥大碉，也有仅能勉强塞进一人的单兵碉。不过最常见的，还是直径3到4米、半掩埋式的圆碉。那些隐藏在草丛中的铁灰色圆碉，就像一口口倒扣的铁锅，或者是一只只静止不动的大乌龟，趴在那里窥视着过往行人。阿尔巴尼亚碉堡用优质的钢筋水泥建造而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到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碉堡，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当地人说，一座碉堡的耗资、耗材，足可建造一套标准的两居室住房。由于大量人工、材料消耗在碉堡上，阿尔巴尼亚人不得不长期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



大饥荒时期，市民捡拾菜叶充饥，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持续大规模无偿援助可谓倾注国力，我国正处于三年大饥荒、中苏交恶撤走专家等经济凋敝境地，此间仅无偿对阿援助的粮食就达180万吨

在毛泽东时代，阿尔巴尼亚被视为中国的“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而毛泽东领导人对于这个好兄弟，是相当慷慨，甚至在自己的国家“一穷二白”，自己的人民饿着肚子之际，以倾国之力去援助它。比如从1961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其援助金额就高达9千亿人民币，这其中不仅包括粮食，还包括各式武器、弹药、飞机等。

毛泽东为何要以倾国之力援助阿尔巴尼亚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945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党魁霍查开始执政。当铁托和斯大林发生分歧时，阿尔巴尼亚站在了苏联一边，断绝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然而，当1950年代斯大林死后，苏联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十分不满，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反对苏联等国家中共的围攻。而1949年建政后的毛泽东，在国际上备受孤立，最初只能倒向苏联，但后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中苏出现分歧。阿尔巴尼亚对毛泽东的支持，让毛泽东“甚感欣慰”，双方

开始了“蜜月期”。1956年8月，霍查率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毛泽东亲自接见。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团回访。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每次都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五大”。康生向大会宣读了贺电。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阿尔巴尼亚。对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也表示了积极和狂热的支持。

作为对阿尔巴尼亚的回报，毛泽东开始向其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尽管此时的中国也是困难重重。资料显示，援助武器中仅火炮一项装备中国就无偿援助了阿1万余门，这个数字连当时的美国和苏联的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个数。而1961年到1978年，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战争行动，资料上说是除了满足部队平常需要外，还有相当数量是作为战争储备而藏进了地下军火库。除了援助各式武器外，毛泽东还派员教授如何使用受援武器。一个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多万的 国家，却密密麻麻分布着几十万座碉堡吗？这便是碉堡之国阿尔巴尼亚的独特景象。而为了建碉堡阵，阿尔巴尼亚共花掉1亿多美元。这些钱自然仰仗毛泽东的援助。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经济方面的援助，则主要通过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援助，中国除了向阿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并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几千万中国人因为毛的大跃进政策而被饿死时，一艘本来应该开往中国的运粮船，却因阿尔巴尼亚需要援助而掉头驶向了该国。

根据中共公布的资料，从1954年至1978年，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

据时任中国驻阿大使的耿飏在回忆录中所述：“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试想，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会在本国经济滞后的情况下，会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而以举国之力去援助他国呢？如果将这些援助用在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用在拯救被饿死的几千万国人，结果会怎样？！一个依赖外援来维持的国家和一个宁可饿死老百姓也要外援的国家，都不是正常国家。

毛泽东的援助也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回报,开始为中共加入联合国暗中使劲。1971年9月25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23国向联合国提交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A/L.632草案及其1、2号附加文件)。10月25日,联大就上述草案进行了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该草案,这就是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中国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军用张继和坦克,以及火炮一万余门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阿要求中国提供新贷款,在贷款项目下提供成套设备20个项目,一般物资98项,另外要求提供现汇贷款5000万美元。以上三项共约值50亿人民币。1975年6月阿尔巴尼亚派部长会议副主席查尔查尼为首的政府经济代表团来华商谈。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经不少,这次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要求,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另外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所以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在周恩来会见代表团的谈话时强调中阿双方应实事求是。中方向阿提供的援助与阿方的要求之间差距较大。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派人回国请示,后查尔查尼以阿党中央名义宣称:对中国突然地严重减少对阿援助“很不理解”、“很不满意”、“严重不安”,坚持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需1976-1980年

应偿还的贷款。阿方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尔巴尼亚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的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表示“遗憾”。



文革中，“中阿友好”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

不久，在阿尔巴尼亚的半山坡上刷出了红色大标语，内容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这很清楚指的就是中国，因在那个时期，不可能也不会指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经济方面的关系。



文革期间，大量印制的宣传画和张贴的街道标语，宣传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友谊”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在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此可能产生误解，所以中国总理周恩来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说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政策，说明这是中美之间的“谈判升级”，是美国“找上门来的”。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阿尔巴尼亚大使说要回国

作汇报。

阿大使回国汇报后返回北京时带回了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的信递交给周恩来。信中对中阿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决定“突然”，指责中国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说“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有过同敌人进行各级会谈的很多例子，但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可能重现，因为那是在不同的条件、时间和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信中说：“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信件详细阐明了阿劳动党反对的理由，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分歧。毛泽东 1974 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坚决反对这一理论，认为“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些使已出现严重政治分歧的中阿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1975 年，阿尔巴尼亚面临的经济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1976 年，新宪法开始实施。此时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分歧已经表面化，开始对其国内的一些中国人提出公开的批评。同年 1 月两国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政府还逮捕了数以千计支持中国的干部。1978 年，霍查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阿尔巴尼亚坚持拥护斯大林及其路线。1979 年 1 月，阿尔巴尼亚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为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举办了官方的、民间的庆祝活动。1970 年代，由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以及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双方出现了分歧，高层往来减少。

自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结成的亲密关系，在 1970 年代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后，两国到了 1978 年底终于彻底破裂。自 1979 年起，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贸易、文教、科技关系，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阿关系这种“冬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1983 年。

在中阿两国之间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情况下，双方都还愿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政治关系方面基本上保持正常，但是，中阿高层来往减少，热情也呈下降趋势。虽说中阿之间的政治温度呈下降趋势，中国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1976 年后，中阿不合公开化。阿尔巴尼亚开始对其国内的一些中国人提出公开的批评，还逮捕了数以千计支持中国的干部。1978 年，霍查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未能满足阿尔巴尼亚对外经援、军援的庞大要求，成为后来中阿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百废待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要求无法全部满足，也无法及时满足，阿不但不体谅中国的困难，反而把不能满足对它的援助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两国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毛泽东援助阿尔巴尼亚，其中仅火炮一项装备中国就无偿援助了阿 1 万余门。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有一万余门火炮，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个数。装备万余门火炮是一支庞大的炮兵部队。阿尔巴尼亚处处可见中国造火炮。已解密的中共党史资料证明了中国援助这批火炮的情况，“1961 年至 1978 年”期间，这期间阿尔巴尼亚没有战争行动，因而不存在战争损耗。看过有关资料才明白，原来阿尔巴尼亚除了满足部队平常需要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火炮作为战争储备。

中国对阿的总援助金额按照现时的汇率来计算，19 年间对阿国援助总额达到 9000 亿元之巨中国大陆是举国之力、倾国之力去援助阿尔巴尼亚。

1978 年底正值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不过，邓小平主政时期，在中国重点援助的国家名单上只增无减，增加的援助国家主要是 3 个非洲“友好”国家。

有人又会骂当时的中国领导为什么养了阿尔巴尼亚这只白眼狼？其实，中国进入联合国，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当时派了他们最强的外交使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竭尽全力做与阿友好国家的工作，让他们投中国的票，给中国帮了忙。只是回报的代价实在巨大，甚至在后期变成阿尔巴尼亚对中国赤裸裸地索取及勒索。

1978 年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对阿军援后，阿尔巴尼亚利用储备军援，部队训练等没有受到影响。直到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阿尔巴尼亚军队装备还是全部中式装备。1992 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大选中被民主党击败，结束了长达 48 年的一党独裁，阿尔巴尼亚军队使用的还是中国装备。阿尔巴尼亚民主党想进口西欧国家的武器，穷得拿不出更新武器的钱，只好凑合着用中国 1960、1970 年代援助的武器。

1990 年阿人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取消宪法中规定阿劳动党是唯一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确定阿是政治多元化的法治国家；阿公民有成立党派和政治组织的权利。总统为国家元首，由议会秘密投票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 年，可连任一届。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提名任命部长。2008 年 4 月通过宪法的修正案。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即各政党按其所得票数在总票数中的比例获得议员席位；在由 140 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超过简单多数，即 71 名议员，即可决定总统人选，而不是原来规定的超过议员总数的五分之三，即 83 名议员。

1992 年阿“人民军”改名为“国民军”，建军节也由 7 月 10 日改为 12 月 4 日。阿武装力量的使命是，捍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法秩序。

至此，阿尔巴尼亚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只是，中国离正常国家的距离，还十分遥远。



[【返回目录】](#)

## 盛洪：政府份额膨胀，利润空间殆尽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 50 人专家成员。本文为 2018-9-30 **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本文作者**盛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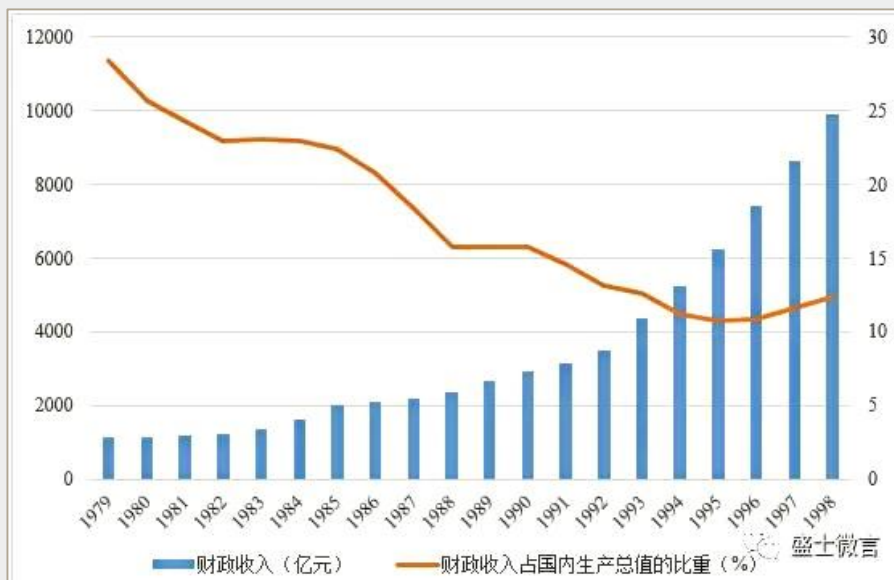
简单地说，“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市场化加低税负。市场化的道理我们已经懂了，它既能激励我们的工作，也能极大改善资源配置。而那个指导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也是在成千上万的人互相交易中形成的。更长远来看，市场制度还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专业化，进而也能推动制度的变迁。

那么“低税负”是什么意思？税负对应的是公共服务。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和公正裁决的公共服务需要资源来支撑，所以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公共服务提供的条件，所以税负就是任何产品中必需的成本。当税负——公共服务的成本低廉时，其它生产要素的报酬就相对高，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更大的动力进行生产和投资。

如果税率只由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自己决定，就不会低。因为公共服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政府行政部门会定一个垄断高价，并且还可以强制执行。那么，低税负是怎样决定的呢？理论上讲，在一个法治社会，税率由民众的意愿决定。具体形式就是民众选代表，代表定税率。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条件，怎么就形成了低税负？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参照系是计划经济，效率极低，不仅民众穷困，政府官员也不富裕。据说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出访英国，发现英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是自己的六倍，大吃一惊。因而，当市场经济的效果刚开始显现时，政府部门参照计划经济时的收入规定自己的收入，虽然在绝对量上比以前有很大改观，但仍处于一个低税率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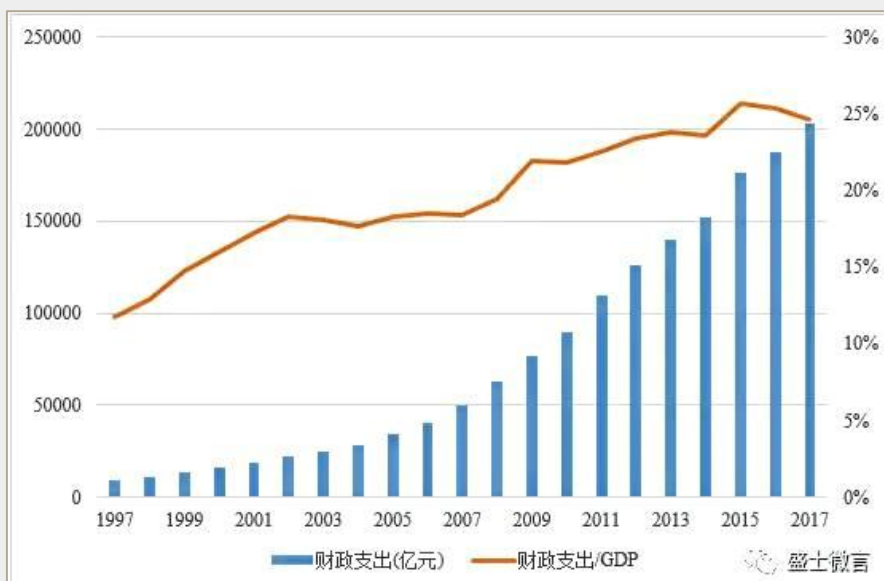
这被统计数字所印证。从 1978 年到 1995 年，财政收入逐年显著上升，但税率（财政收入/GDP）在逐年下降，直到 1995 年低至 10.5%。这当然是狭义的税率概念，但也足以反映税率的下降趋势。正是这样的低税率配合市场化改革，才造就了中国奇迹。

图 1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占 GDP 的比重（1979 年~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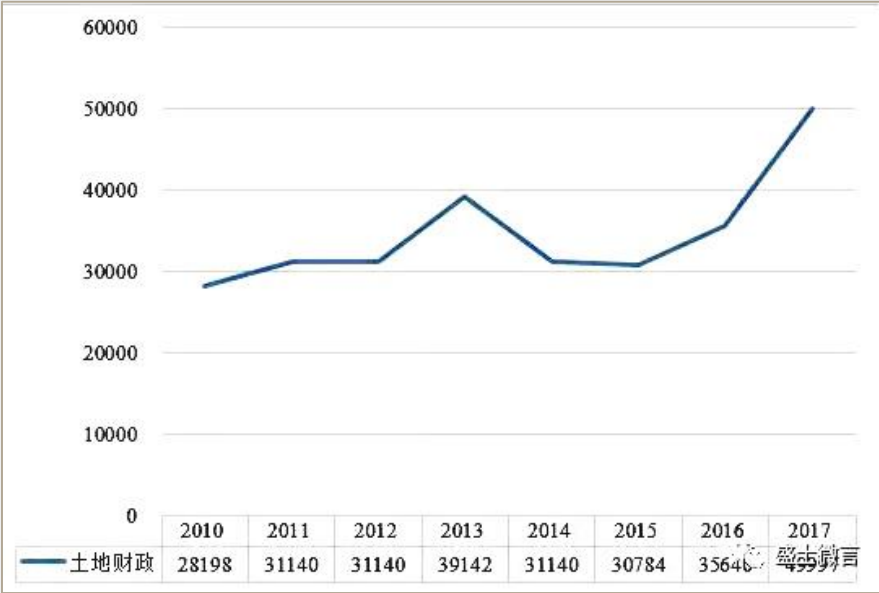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焕发出越来越高的效率，涌流出巨大财富。政府部门的参照系也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到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时，税率仍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仍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政府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是经济人本性驱使它逐渐增大宏观税率。这包括以税收为主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和资产的机会收益,以及医疗养老保险。从 1997 年到 2017 年，一般财政支出从占 GDP 比重的 11.7% 增加到 24.6%，提高了 12.9 个百分点。

图 2 一般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1997 年~2017 年）



自 2000 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住宅商品化，土地价格显著上涨，也开启了政府行政部门从中分割利益，即土地财政的阶段。对于这一部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分割，我国更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因而土地财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从 2010 年的 2.8 万亿增长到 2017 年的 5 万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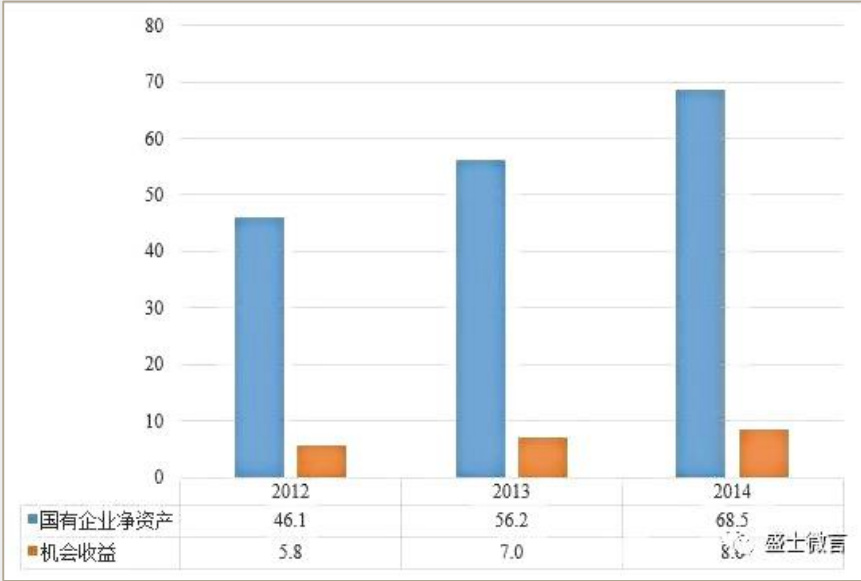
图 3 土地财政收入 (2010 年~2017 年)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据李扬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也在逐年显著增加，从 2012 年的 46 万亿上升为 2014 年的 69 万亿（《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 43 页）。按照合理的利润率，即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廖理和汪毅慧，“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研究”，《金融研究》，2003 年第 4 期），约为 6.15%加 6.38%等于 12.53%估计，如此巨大的净资产的机会收益应有数万亿。见下图。这也是宏观税率的一部分。

图 4 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及其机会收益 单位：万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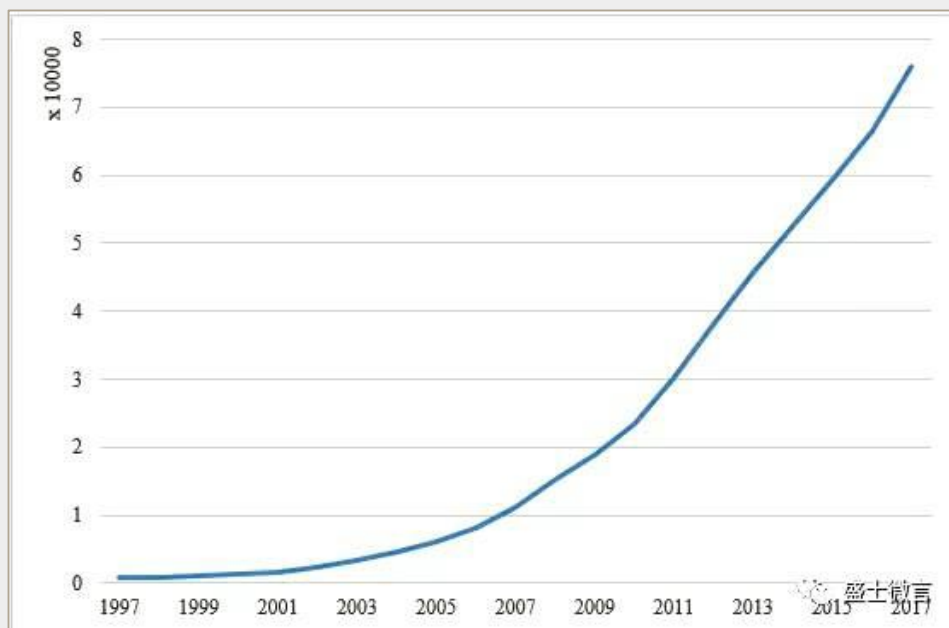


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余额，自 1997 年以来更是一路飙升，从 832 亿上升为 2017 年的 7.6 万亿，比一年的社会保险收入还要高。这是徒然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却并不发挥作用的部分。

去年我曾估计，2013 年的宏观税率已高达 45.6%。现在根据 2017 年的数据（国企部分用 2014 年数据），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203330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60700 亿元，国有企业的机会收益 8.6 万亿，社会保险基金累计余额 7.6 万亿，共约 426030 亿，占当年 GDP 比重高达 51.5%。在 2013 年的基础上重上加重。

我们已经知道，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它必然进入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成本之中。一个产品或服务由多种要素贡献而成，其中大部分要素是竞争性的，所以相对价格能稳定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甚至有所下降；但有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要素如不加以管制，则会将价格提高到垄断价格的高度；而公共服务的价格则是强制性垄断价格，不仅需要支付，而且不能不支付。当公共服务的相对价格（即占 GDP 比重）提高十几个百分点的同时，就是企业或个人的盈利空间减少十几个百分点。终有一个时刻，他们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图 5 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采用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作为政府控制的宏观税负的一部分，是因为这是社保收入减去支出的累计结果，是不对应于服务的收入，是更纯粹的对社会财富的占有。

有证据表明，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的《2017 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对应着税负的逐年增加，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从 2009 年的 10.68% 下降到 2016 年的 7.12% (2018)。见下表。

**表 1 制造业民营企业税负水平和总资产报酬率** 单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利润税负水平	69	56.6	59.3	76.9	72.1	71.5	79.2	75.9
实际所得税率	16.5	16.5	17.7	19.9	18.8	18.7	30.7	19
总资产报酬率	10.68	9.33	14.96	9.33	8.35	7.79	6.65	7.12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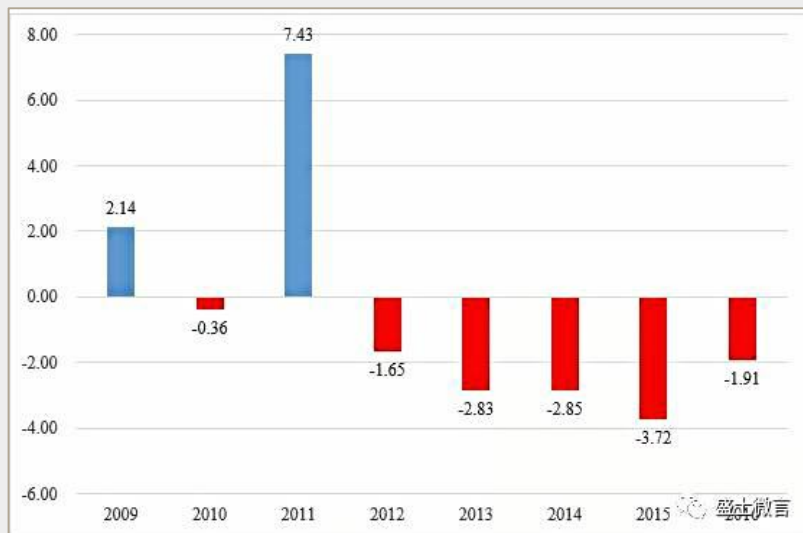
假定资产负债率为 38%（汪娟和王凯，“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科技经济市场》，2017 年第 8 期），则估计出净资产收益率，减去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再减去中国股票市场合理的风险溢价，则可作出判断。我们看到，自 2012 年以来，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已经是负值。其含义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已不能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平均的市场回报，还不如按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进行一年期的贷款业务。这表明，就是在这几年，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表 2 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推导的净资产收益率	13.92	11.62	20.21	11.13	9.70	8.89	7.35	8.57
一年期贷款利率	5.4%	5.6%	6.4%	6.4%	6.2%	5.6%	5.0%	4.4%
再减去风险溢价平均值	2.14	-0.36	7.43	-1.65	-2.83	-3.49	-4.53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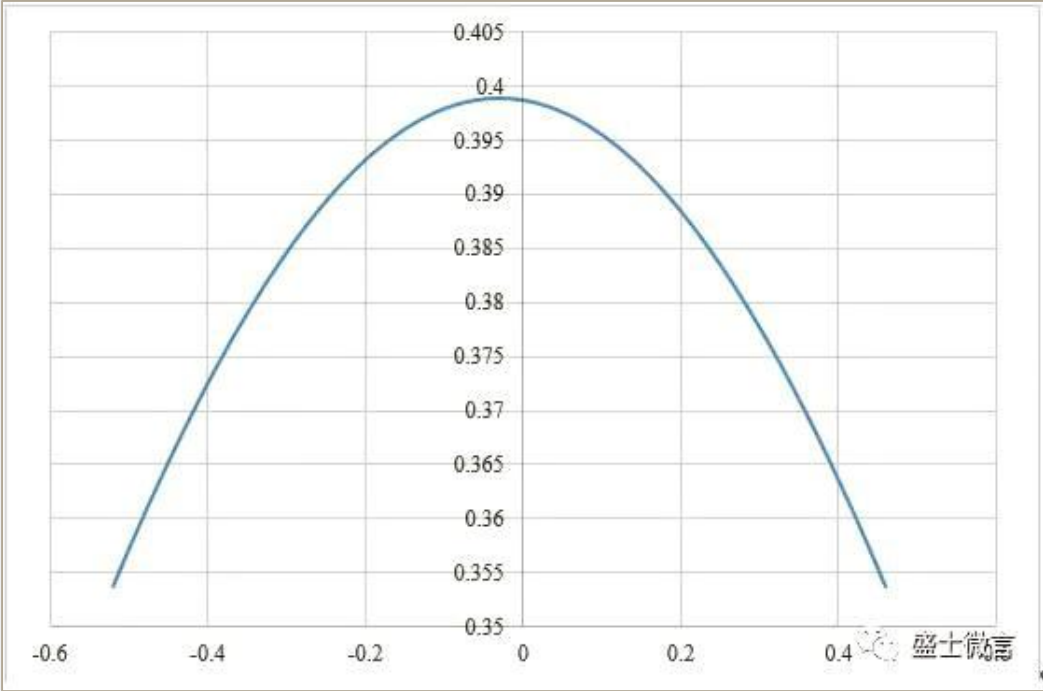
**说明：1.** 这里采用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是因为管制的和垄断的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约 1~1.5 个百分点，且参照国债利率做适当调整；**2.** 本文仍用无风险利率作为财务成本，实际上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可能以这样低的利率贷到款。这也说明本文的估计是很保守的，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要更低。**3.** 用来推导净资产的资产负债率是 38%（汪娟和王凯，2017）；**4.** 这里采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为 6.38%（廖理和汪毅慧，2003）

**图 7 减去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的净资产收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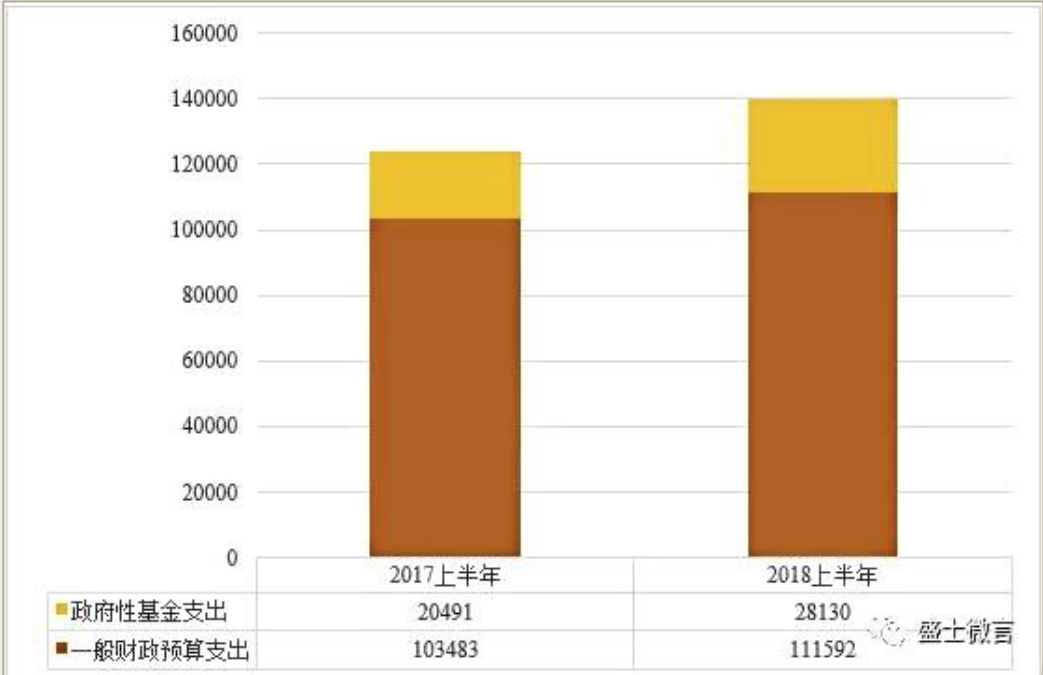
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平均值。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为零，则大约一半企业的资本收益低于市场合理水平。用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值 - 2.6%估计，这样的企业比例就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它们大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如果平均值向负的方面移动，即使很小，也意味着有明显多于一半的企业资本得不偿失。如下图。

图 8 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



说明：纵轴是分布概率，横轴是净资产收益率

图 9 2018 年上半年的般财政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财政部网站

如果一多半企业的资本处于得不偿失状态，他们就会停止生产，遑论投资。这会导致衰退。问题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糟的是，这样一种趋势不仅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在加速。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增长了 7.8%，而 GDP 则只增长了 6.8%。而据财政部，今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8130 亿元，同比增长 37.3%。两者相加同比增长了 10.5%。

更有一种“税改方案”，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将社会保险的收缴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移交到了税务总局，这导致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对社会保险金额的提取的基数就不是原来的基本工资，而是全部收入；第二，税务总局收缴具有强制性，原来不愿意加入社保的企业或个人就不得不缴纳社保费。这会使宏观税率进一步上涨。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不应是一种强制性征收的税负，而应留有让企业和公民自愿选择的空间。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付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灵活雇用工人，不交社保费（工人也不要），在萧条时才能安然渡过。因而这种改变不仅不是一个正向的改革，却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现在应该到了悬崖勒马，立即刹车的时候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如此行动的机制。要想刹车，首先要知道危险，知道车辆已经越过了危险边界。如果车前方的挡风玻璃不是透明无色，能够真实观察前方路况，而是过滤掉危险情况，只能看到安全和美丽景色的话，也不可能发现应该刹车的理由。这就是说，对于经济形势，如果没有一个全方位的透明的信息表达机制，没有不同观点的讨论与交锋，就不可能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关于宏观税率问题，经济理论界和企业界早有警示。2016 年底，我们的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了宏观税率太高的问题，并提出“死亡税率”的警示，立刻遭到压制，直接有人要求课题负责人闭嘴。现在网上有关减税的文章也经常被删除。利润空间殆尽，只因意见空间殆尽。实际上，任何一篇报告未必正确，关键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要保证所有的人表达自由。尤其在事关宏观政策方面，更要有一个保证各种声音都能发出的意见生态。这才是一个社会的透明的挡风玻璃。

有了关于路况的真实信息，如果没有灵敏的刹车系统，车照样停不下来。财政支出的刹车系统，就是对财政支出的约束机制。然而在我国，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刹车系统。在文字上，我国各级政府的收支要经同级人大审批和监督，但历史证明，这个刹车系统是失灵的。一般情况是，每年的财政收入决算一般会超过预算，支出一般会超过收入，支出决算一定会大大超过收入预算。下表是最近 10 年间的情况。这意味着，人大虽然表面上批准了财政收入预算，但对超过此预算的结果无力纠正，只能认可决算；对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况也无法制约，只能认可支出决算。因此这是一个失灵的刹车系统。

而这辆无法刹车的汽车却有着充足的动力，这就是吃税人的利益冲动。我们在多年前问一些官员关于税收的看法，他们认为税收就是拿来给他们花的，如果花不完就突击花，而不认为税负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如果没有花完，就要留给民众和社会。这样的看法到现在仍没有改变，因

为这个群体既没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的传统观念，也抵触有关“纳税人”的概念。他们还有一个习惯看法，即这些年宏观税率不断被他们提高，但似乎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预言的恶果，他们甚至质问，如果有“死亡税率”，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显然是倒果为因。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的经济奇迹，恰是原来较低税率的结果。而这些年税率并没有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是不断提高，且在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一定的利润空间，但这个空间一定会随着宏观税率的上涨不断变小以致消失。

**表 3 中国财政的超收超支 (2007~2017)**

年份	全国财政超收额 (亿元)	支出超过收入额 (亿元)	超收幅度	超支幅度	支出决算超出 收入预算幅度
2007	7271	- 1541	16.5%	-3.0%	<b>12.5%</b>
2008	11405	354	19.5%	2.1%	<b>22%</b>
2009	7749	9500	11.7%	11.4%	<b>24.4%</b>
2010	9167	10000	11.2%	8.1%	<b>20.2%</b>
2011	14176	8500	15.8%	5.2%	<b>21.8%</b>
2012	3635	8000	3.2%	7.4%	<b>10.8%</b>
2013	2533	12000	2.0%	8.5%	<b>10.7%</b>
2014	837	13500	0.6%	8.1%	<b>8.7%</b>
2015	- 2031	16200	-1.3%	15.5%	<b>14%</b>
2016	2352	28289	1.5%	17.7%	<b>19.5%</b>
2017	3937	30763	2.3%	17.8%	<b>20.6%</b>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我相信宏观决策者们都清楚拉弗曲线所阐释的道理，知道减税最终会带来税收的增加；更知道相反的结果，如果税率过高会导致经济衰退，税收也会减少。但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他们若要减税也要遇到巨大的障碍，首先是吃税人利益集团在这些年的财政支出飞速上涨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利益刚性，而且形成了利益膨胀刚性，即他们习惯于每年都增长的收入。他们必然要顽强对抗停止政府份额增大的任何企图。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经济由于税负过重而减慢或衰退，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收入不能减少，其他人的收入都是软的。这种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不少地方的税务局已经提前征税，即使是在北京，也有的地方税务局在年初就征全年的税了。

进一步说，减税导致税收增加的结果，是在社会和政府的整体范围上、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然而现在的行政部门一方面是短视的，只关注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因而它们不愿意为较长

时间的结果而忍耐当下的停止增税或减税；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的，它们不愿意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约束局部利益的膨胀，并且认为自己这个局部多收一些无关大局。而从整个政府结构来看，也没有对增加税收行为的有效惩罚，这就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

那么，是否就没解了呢？不是。如果宏观决策者认识到问题严重且紧迫，痛下决心阻止恶果的发生，不惜使出霹雳手段，还是有办法。刹车坏了，还可以勒手刹。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短期，在当下，就是救急；一是在长期，就是要改革制度结构，真正建立起约束财政支出的机制来。所谓“救急”，第一，就是要采用当前政府行政部门行之有效的手段，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负责人进行一票否决式的约束，如果该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超过当年该地区 GDP 增长速度，就地免职。这种方法在许多场合曾经采用过，如在非典时期就采用过，并且非常有效；第二，在全国层次，可由国务院直接审查没有经过立法机关同意的各种税费，并加以废止；第三，在立法层次，则要进行直接的减税，这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如将企业所得税率降低 5 个百分点以上和增值税率降低 3 个百分点以上。

从长期看，就是要建立起社会的透明的挡风玻璃和灵敏的刹车装置。这意味着要真正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保证民众的表达自由；要把人大这个立法和监督机关建设成有效约束行政部门财政支出扩张的强有力的机构，这同时意味着要简政。当然所谓“长期”，并不意味着“以后再做”，而是要从现在做起。比如“表达自由”这件事。看清楚汽车前面的路，才能避免跌下悬崖。如果不是这样，例如这篇文章不能发出，或者发出了又不见了，前途可能凶多吉少。 🚧

2018 年 9 月 22 日于五木书斋

[【返回目录】](#)

## 资中筠：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纳粹“成功”建造的两根柱子

[**资中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本文转载自 2017-09-23 新浪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资中筠**先生

顶层一个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的领袖，由两根柱子支撑：一是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用民粹主义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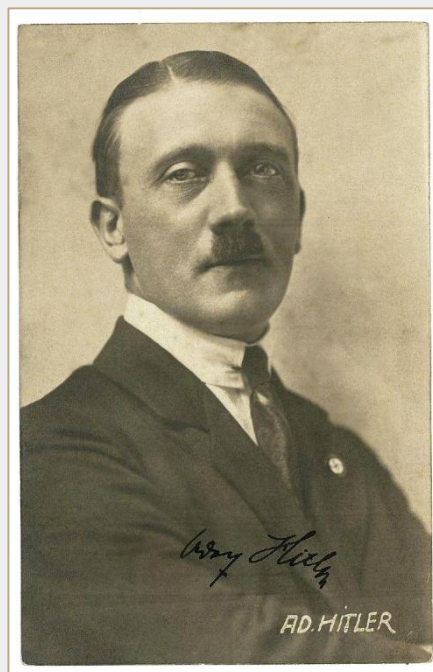
有的时候，那些饱学之士也不见得不犯糊涂，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

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因此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足以祸国殃民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两大危险。

### 希特勒其人

我们一般对希特勒的印象是脸谱化的，来自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里那样一个丑角，或者苏联电影里的恶魔和狂人。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疯子，他不可能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成就那样的“业绩”，有这么大的影响。希特勒出生卑微，但是受过正常教育，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他不愿继承小公

务员父亲这样平凡乏味的生活，有一番雄心壮志。他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经历过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层老百姓的需要，但决不认为自己是他们中间一分子。他认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攻于心计，擅于利用时机，不择手段，敢于冒险。应该承认，他有真诚的信仰，就是大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理应统治世界，这点他深信不疑。他最高的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早年既是款热的民族主义者，  
1919年9月，偶然的会希特勒接触到仅有54名成员的“德国工人党”的政治团体，  
成为该党第96名党员、并凭借演说口才成为主席团委员，  
该团体以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反犹主义为纲领，既后来的“纳粹党”，  
1921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党的党首

另一方面在夺取权力的时候，完全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公然背信弃义，以此战胜按常规办事的政敌。另外，他有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集会时的讲话非常有煽动性，但是承诺并不准备兑现。

### **纳粹思想的特点**

我认真读了《我的奋斗》。从中提炼出几点他的主要思想。

**1. 极端种族主义。**认为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就相当于猴子和老虎一样是不同的物种，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最后剩下几个比较优秀的物种（人种），文明才能进步。日耳曼民族和犹太人就属于物种的两端，犹太这个物种理应被消灭。其他种族分优劣等级，优等的是统治者，劣等的为奴隶，做苦役。

**2. 完全轻视或抹杀个体。**个体的生命是不重要的，他所谓的“民众”“公众”，都是以集体为单位的。所以一切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

**3. 厌弃议会民主。**《我的奋斗》里面有很多篇幅批评议会的弊病。不过他不是要改善民主制度而是要代之以比一切专制制度更加专制、高度集权而残暴的统治制度，他宣称要促进文明的进步，结果是文明的倒退。



**希特勒**自封第三帝国元首后的取消了各州议会，宣布纳粹党为法定的“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由 5 万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其中 4 万人是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1 万人是钢盔团成员，纳粹的暴力组织以警察的身份合法化，在其集权统治下禁止政党和工会、迫害文人、控制传媒，并严密控制思想和言论，学校、企业、广播电影完全成为希特勒的政治宣传工具

**4. 蔑视法治。**他很讨厌法律，在未上台前，对那些法律可利用就利用，利用不了就跳过去。到掌权后，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最后他本人就是法律。从观念上，从根本上，不要法治，要一人独裁。

**5. 特别强调宣传的力量，明确主张欺骗群众。**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一战”中被打败，非战之过，是宣传之过。一方面是英、法等敌人的宣传；更重要是国内的“叛徒”（相当于今之国骂“汉奸”）瓦解士气的宣传——指战争后期德国国内主张停战、和谈的舆论。他一方面鼓吹日耳曼民族如何优秀，一方面极端蔑视德国普通人，明确说，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不能对他们讲逻辑、讲道理，那是说给知识份子听的。民众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地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

**6. 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而要用仇恨。**他说各种人群平时总是想着各自“自私的”利益，是分散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团结起来，把这个敌人视为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指向同一个目标，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当然希特勒所树立的共同敌人就是犹太人，用这个把德国人团结起来，还很有效。



1922 年希特勒少年冲锋队正式组建，1930 年希特勒青年团已超 25000 人，  
还为 14 岁至 18 岁女青年设立的德国女青年联盟

**7. 不相信国际和平。**从来不相信通过贸易、和平竞争，能够使德国繁荣起来，而是相信暴力和战争。他提出著名的“生存空间”的口号，赤裸裸地主张德国就应该走出去，占领别人的土地。殖民地已经被英、法这些国家瓜分完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不过他不要向非洲扩张，因为非洲太落后了，而要占领欧洲的地盘，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在他看来，斯拉夫也是劣等民族，即使不全部灭绝之，也要占领他们的地方，奴役这些人。所以他主要目标是东扩，占领东欧、俄国，认为俄国人拥有这么大片土地是不公平的，德国人应该在那里多生孩子，把优秀的种族传播到那里去。可见他要打俄罗斯蓄谋已久，斯大林以为可以祸水西引纯属幻想。



“纳粹冲锋队”被称为武装的黑社会，与党卫军、国防军三支，  
共同构成了纳粹党统治时期的对内极权统治、对外发动战争的武装力量

概括说起来，他所设想的框架就是：顶层一个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的领袖，由两根柱子支撑：

一是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用民粹主义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希特勒上台的经过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上去的，这是误区。纳粹之得势，的确是靠前面讲的煽动，曾取得大批群众拥护，但是希特勒的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靠阴谋诡计一点点把权力夺过来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败涂地，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胜国进行高额赔偿，经济枯竭，马克贬值，民不聊生，而且民族感情上受了很大的屈辱，跟战前一段时期的繁荣昌盛呈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以复兴优秀的日尔曼民族为口号，一定能赢得广大人心，这是纳粹得势的基本条件。

希特勒在 1922 年成立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有 25 点纲领，主要就是贯彻上述希特勒的思想要点。党纲的条款措词后来有所改变，但是基本精神没变。党的名称中“工人”字样后来也取消了，剩下“国家社会主义”。关于这个名称的内涵，党内曾经有过分化。当初参加这个党的人，有不少是真心主张社会主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现希特勒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他相信的是国家主义。要“国家”还是要“社会”，就发生了分歧，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就退出了，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所以纳粹党的实质是国家主义，然后国家又变成一个党的国家，党成为一个人的党。把“国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虚，集权的国家主义是实。这个过程很值得深思。

1923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啤酒馆造反。他的“冲锋队”是失业工人、流氓、小偷、无业游民，对前途渺茫的失学青年组成的乌合之众，就是他的打手。他利用这群打手，在德国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在啤酒店做演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作为人质，要他公开声明同意纳粹的主张。但最后他失败了，被抓去坐牢。他在狱中找人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总结了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思想，决定放弃武装暴动，通过在现有制度下博弈夺取政权。

出狱以后，希特勒威望更高，他就用纳粹党的口号到处去煽动群众，提出德意志民族统一和恢复领土；全面反对犹太人；保持纯粹人种的德意志国家；集权于一个党一个领袖；否定凡尔赛条约，不再付赔款利息等等，特别是提出要让大家有面包和工作，还有维护工人利益，打击财团。这些口号为纳粹党赢得了很多选票。他一方面表现出同情工人，反对财团，但是私下里跟非犹太人财团的老板去会谈，许诺了他们很多好处，所以他两边都讨好，财团给钱，工会有群众，逐渐壮大势力，成为议会中的大党。

他还用各种谎言和威逼利诱达到他的目的，利用了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玩弄议会规则，用各种手段把对手一个一个搞下去。他用“国会纵火案”栽赃共产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又通过各种绑架、暗杀、打砸抢等等，造成国家危机状态，然后利用《宪法》的一个条款：危机时候可以解散国会重新改选。在短短几年中搞了四次这种花样，最后一次适逢兴登堡总统去世，他拉拢了兴登堡的儿子，隐

瞒遗嘱，夺取了总统的位子，从此自封为“元首”。

### **与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角逐**

纳粹的最主要劲敌是社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原来力量很大，掌握大部分工会，在议会中居第一、第二，是如何败在希特勒手下的呢？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75 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分出去，于 1918 年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希特勒最初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党”是社民党，他把他们和犹太人合二为一，作为他最痛恨的敌人。在《我的奋斗》里有很多地方社民党和共产党交替使用，对他说来是一回事。他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党不是把工会作为维护雇员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手段，而是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按，这点没有错。因为共产党一向批判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就是只顾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想夺取政权）。他认为自己看穿了社民党的虚伪和蛊惑群众的伎俩，由此，他对群众心理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

广大群众的心理和女人一样，不会为抽象的说理所打动，而只能为强有力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所折服。犹如女人在感情上渴求强有力的男人一样，人民群众宁愿被统治，而不要被恳求。接受不容置疑的说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给他们自由选择权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而会感到被抛弃。他们不会在思想上受恐吓为耻，也不会意识到自由权利和人身受到侵犯。他们不会怀疑整个学说的谬误，而只为宣扬这一学说的那种专横的气势所慑服。

这就是希特勒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群众成功的经验。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用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论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此进行一场最残酷的斗争在所不惜，只要用同样无情的手段强制推行，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祖国是资产阶级的祖国，根本不值得保卫。这是当时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这与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完全是两个极端，两相比较，当然民族主义的口号更能得人心。到 1918 年德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列宁又脱离了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也就是彻底与社民党分道扬镳。德共换了几次领导，最后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社民党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提出中间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根据这一论断，指示德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先击败社民党，纳粹如果上台，就是资本主义末日，再发动群众打倒它，然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希特勒的两大劲敌根本不可能联手对付他，而被他用各种阴谋、“阳谋”打垮了。

### **纳粹统治内容**

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过《纽伦堡法》，正式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以后对他们迫害逐步升级，直到种族灭绝，这是德国纳粹的“特色”。

以下讲几点有普遍性的：

**一，焚书坑儒，控制思想。**真的烧书——有名的“水晶之夜”，把过去许多优秀作品，主要是犹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书籍，都从图书馆以及人家中搜出来烧掉，敢不交的，一经查出就治罪；“坑儒”就是就采取各种办法，清洗和改造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他的“帝国宣传部”权力大无边，对出版、新闻严格管制，把本来存在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行业协会等等全部由纳粹党掌控起来。特别是控制宗教，先撤换教区主教，用纳粹党的牧师传道，以后成立国家的教会委员会，把所有宗教统一起来。以纳粹信仰取代宗教信仰，公然提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上帝的意志，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我的奋斗》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摆放在教堂的祭台上，并且家家必备。

**二，教育清洗，培训青年。**从小学中学开始党化教育，灌输一个信仰、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原来高校校长是教授委员会选的，现改由政府任命，对教授进行甄别改造，主管教育的头头自豪地说，在自己努力之下，学校不再是一个玩弄学术机构，而是忠于元首的政事机构。这还不够，在正规学校之外，又成立各种特殊的青年培训学校和党校，强化思想训练，而且还要求体魄强健，进行斯巴达式的军事训练。从小学生开始，各种年龄段的青、少年都组织在某种组织中。造成广大青少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下一代的青年只听元首的，不听父母的。所以纳粹很多青年，六亲不认，对父母都可以告密。

**第三，破坏法治。**恣意改造、控制现有的法律系统，干预司法，但仍嫌法律程序碍手碍脚。于是在法外成立“秘密警察办公室”，其缩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盖世太保 GESTAPO”，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抓人，又发明集中营，可以不经过审判把人无限期关起来，强制劳动，过非人的生活。

**第四，控制和发展经济。**任何统治没有财力的支撑是不行的。不过通常流传的说法，说德国全靠希特勒上台，克服了通货膨胀，扭转了经济形势，并不准确，有个时间上的差错。经济最坏的情况是在1918-1922年，从1922年以后就开始好转，原因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复苏和繁荣的阶段。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肯定是受益。特别是美国开始给德国贷款和投资，这时西方国家也放松了赔偿的要求，所以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德国曾有一个经济恢复期，开始有了一点资本，工人的就业率也提高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到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德国也不能幸免。1922-1929年这段时期，是希特勒的蛰伏期，经济好转与他无关。但是1929年的经济恐慌却在政治上帮助了他，利用这一形势获得大批工人和下层百姓的选票，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也增加了选票。

纳粹德国最初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没收大批犹太人的财产，银行、企业，这笔财富是很可观的；二是非犹太人的财团给他的资助。用这些“原始积累”购置设备，发展工业，重点发展军事工业，逐步解决失业问题。搞铁饭碗，压低工人工资，工人一旦被雇佣，就永远不能再换工作，但是也不会失

业。工会完全归入纳粹党的领导下，不能再搞请愿罢工之类。工人福利并未恢复到一战前，而是把工人的娱乐生活也统一起来，完全由组织安排划一的休假、旅游。经历过前一阶段艰难的工人一般也还满意，因为勉强温饱总比失业好。

**第五，剥夺了地方自治权，地方官都由纳粹党指派（原来德国的各州是高度自治的），实现中央集权。**

**第六，拉拢少壮派青年军官。**这点很重要。老一代军人一般看不上他的作风，还有原来的传统和原则。而年轻军官在和平时期要上升是比较慢的。希特勒的民族复兴的口号和战争计划正好满足他们的野心。争取军人的支持，对他当然很重要。

1936年他办了一个奥运会，对内把德国人的荣誉感调动起来，对外欺骗国际，造成他要和平的假象。在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发动战争了。

### 法西斯专政的特点

现代法西斯统治与传统的皇权专制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高度政教合一，过去的皇帝不兼思想家，康德对腓德烈大帝说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学家，二者互不干涉。中国过去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求哪个神，拜哪个佛，皇帝不管；欧洲走出中世纪，经过了政教分离，君主是不管人的灵魂的。信仰上帝的人把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上帝不可能介入政治生活。而纳粹就是以元首的思想取代宗教信仰。纳粹的统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组织力量非常强，个人从灵魂到日常生活都在组织之中，这是法西斯统治的特点。即使在中世纪，教皇、红衣主教的权力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领袖之所以成为神，靠的是有大众对他的膜拜，如果没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领袖神化，需要完全丧失理性判断的群众，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需要推行反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群氓主义，培养绝对的愚民，不但在智力上，而且在道德上抛弃和蔑视一切传统、行为规范、善恶是非标准。只要忠于元首，政治正确，其他一切伦理、亲情、友情、忠诚、信誉??都可背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更不要仁爱、人道，而代之以仇恨。凡是被指为敌人，就可以施以任何非人的、残酷的手段。这种敌人是先验的，与他的行为表现无关，人性中最卑鄙、自私、残忍的一面，可以在一个“崇高”的外衣下尽情发泄。

为实现一个人的集权，希特勒讨厌中间的官僚阶层，要民众直接效忠元首。既然内阁各部不能取消，那么他就成立各种“办公室”，各种“小组”，只要一些办事人员，直接听命于元首。不但法律程序打乱，行政程序也打乱。他怕大权旁落，对各级官员都不信任，只信任身边亲信，而这个亲信的圈子越缩越小。最后谁也不信任了。（中国皇帝中朱元璋有点类似，他连宰相的职位都取消了，谁也不相信。最后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办事。所以明朝宦官专权盛行）。

## 启蒙的关系

从希特勒夺取政权和最终完成法西斯专政的过程可以看出，道路很曲折，可谓费尽心机。如果从1922年建党算起，到1934年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用了12年时间。他几次想用暴力夺权而没有这样做，这足以说明德国原来的、即便不够完备的民主制度，还多少形成一道阻力。如果在一个本来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论是用暴动，还是用政变，都要简便得多，时间短得多。而他最后终于得逞，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总的说来还是反对他的力量太软弱、分散，德国的民主制度不够成熟，中产阶级不够强大，最根本的是广大群众的蒙昧和盲从。一个国家主义、一个民粹主义足以蛊惑人心，是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

希特勒声称要振兴民族精神，号召德意志民族“挺起脊梁来”，但是他又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要全民匍匐于他的脚下，等于把全民的脊梁都打断了。所以他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优秀的德意志民族被他拖入了罪恶的深渊。

幸亏德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条线外，还有一条线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主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传统，还有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能使它战败以后，告别过去，获得新生。德国人反思比较彻底，全民都承担责任，所以能产生像布兰特这样的政治家。加以二战以后，英美法等战胜国对它采取了与一战后完全不同的政策，帮助德国恢复经济，接纳它重归欧洲（先西德，后是统一后的德国）。法、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结束历史宿怨，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欧盟，其中的骨干还是德国和法国。从政治上讲，德国最需要欧盟，它从此汇入欧洲的主流。所以宁愿在经济上吃亏，补贴那些要破产的国家。



文革荒诞可笑的宣传画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毁坏文化古迹，破坏经济、挑起民众武斗不事生产、导致全社会物质极度匮乏、经济全面崩溃

## 反思文革

在理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来龙去脉之后，对“文革”就可以有较深的理解，有人把“文革”说成“大民主”，正如把希特勒掌权归之于民主制度一样，是颠倒是非。



试行对比，“文革”许多因素都具备，几乎许多特点都可相对应：神化的领袖、失去理性的狂热的群众、盲目的信仰、任意加罪的敌人（血统论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把某一种或几种人定为敌人，由身份标签决定，与行为无关），砸烂国家机器，打乱社会秩序，各级行政长官都失去权威，以领袖的名义派联络员到各地各单位，全民都是一个领袖的“好学生”，消灭文化遗产，背离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煽动仇恨，崇尚暴力。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不留空隙，直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一点不同，是希特勒建立了“新秩序”，而“文革”没有建立起来，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大治”，为后来形势扭转留下空间，是中国人的幸运。



“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这是文革时期最常见、持续最久的口号标语

总之，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有的时候，那些饱学之士也不见得不会犯糊涂，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因此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足以祸国殃民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两大危险。 ■

[【返回目录】](#)

## 胡德平：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

[ 胡德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中国民商》杂志]



本文作者胡德平先生

1991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一份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私有企业和今后工商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份文件俗称中央 15 号文件。

15 号文件的核心内容主要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第二句话是“更不要像五十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句是“工商联绝非‘一代而亡’，而是重任在肩”。“这项工作的成功，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重大贡献。”中央 15 号文件的印发至今已经 27 年，它有不适应改革进度的地方，当然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但上面说的三点内容仍未过时。当时起草文件的背景，还是全国大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还需等下一个来年。中央还同意了文件这一提法：“我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并在党的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更为规范的表述。

本文史限于文件中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资改造的问题，结合当前实际谈点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国营企业和民族工商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经济各行业的公私合营，速度之快确有中国的特色。首先是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1953 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亲自讲话，这种动员令的作用石破天惊，无人可以阻挡，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任务。民族工商业者首当其冲，用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改造。可取之处，这种公私合营的办法是和平的方法，严格区别开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

暴力的做法。其次，对于民族工商业者来说，对公私合营道路的选择也是被迫无奈的。全国的粮、棉、大部分农副产品、土特产品都进行了统购统销的管制，民间银行率先进行了国有化，一切流通渠道只有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两条渠道。民族工商业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别无出路可走。在工商业者中，白天挂牌，晚上抱头痛哭者当不在少数。第三，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尽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 1953 年 9 月 7 日的谈话为证。在公私合营的运动中，什么资产评估，无形资产，经营管理人才的合理安排，面向市场生产一切都无从谈起。《上海的早晨》一书中形象地反映了公私合营后，资方人士一句经典的话，大意是这样的：原来的生产要考虑花色品种，现在按照计划指令，大批量的生产，生产效率快多了。

我国公私合营速度之快，大大超过党中央的预期，很多中央领导人并不认为是什么好事，但潮流形成之后，任何批评意见都是无意义的了。1956 年 12 月 7 日，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评价这场对资改造的运动呢？他讲：“可以消来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170 页）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今天还难以理解的话，就让实践回答吧。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种机会，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我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面目出现，不少公司还发展为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或成为国际性的公众公司。说来也怪，民有性质的公司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竟占到全国的 70% 左右。我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的民有企业是要发展下去，还是又要借助历史的惯性，重走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的老路呢？

近日，吴小平的文章认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难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吗？我国的股市初立阶段，有人就提出这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大好机会。结果股市建立伊始就变形走样，丝毫不反映经济的总体情况，反而成为大庄家聚财的可心工具。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为人民的需求服务，不是为民富国强服务，而是为“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公有制又是为谁服务？吴小平有些话好像又在说反话，所以我意思的针对性是否准确，待查。

某副部长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怎么把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机制搬到民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他说的“职工与企业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不是打着共享、民主的旗帜搞“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吗？这和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陈有西律师对此的质疑是完全有理由的。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关村的民办科技企业的“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产权模式，经营方式差远了。现在应是改革的深入发展期，而舆论确是如此灰色，政府官员认识又如此混乱，说改革要攻坚，要壮士断腕，不亦难乎？

9 月 26 日，一主流媒体刊登一文，报道“截至目前，已有 40 余家上市民企发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押，触及或跌破平仓线的公告”。“其中十余家公司采取紧急停牌的方式自救，部分公司则主动向国资背景股东‘出让’控制权自救。”文章竟说：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质押平仓风险，而且还会对股价形成利好，有利于延长企业有续期。如果是在一个公平市场上来说这些个案，当然不错，但现实情况是，做实业的民有公司在企业项目的立项、批地、贷款都存在着普遍的，不一视同仁的问题，这不就是歧视性的对待吗？这个极其危险的情况，连党中央、国务院都不回避，我国的主流媒体更要正视民营企业遇到的这些重要问题，呼吁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拿民营企业被迫认可的办法，当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过去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今天绝不再走。

在民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当下，我觉得，今天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和昨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差别太大了。昨天已经认识清楚，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用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起来。仍用一条挤压民营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然公营、私营在公平，一视同仁的环境中，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不但不应反对，而且还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经由否定之否定走上一条历史复兴之路的。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为此，特别介绍一下1991年中央15号文件，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

[【返回目录】](#)

## 张曙光：余老师为人谦和，与人为善

[张曙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 2018 年 9 月 3 日在「余大章先生追思会」的发言]



本文作者和余大章（左）先生的合影

我先讲一下余老师逝世前后几天的事。18 号，高岩和李婧去医院看了余老师，20 日晚发微信给我，说余老师的病情不好，骨瘦如柴，好在靠设备稳住了。知道后，我与夫人商量去医院看望，25 日发微信给高岩，问余老师的病房号，第二天，高岩告诉我，谁知余老师 23 日就走了。28 日接到李婧电话，说余老师走了，我立即给他家打电话，无人接听，就给他儿子打电话。知道余老师走时的情况。30 日，我夫人去他家看望余老师夫人，她们二人的关系很好，两人聊了一天。讲了余老师的病情以及生前的一些情况。

我和余老师同事 55 年，是老朋友了。他 1962 年留学苏联回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我 1963 年报考杨坚白教授的研究生录取到经济所综合平衡组学习。当时我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未成家，住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的集体宿舍里，每天晚上吃完饭，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河边和大街上散步聊天，悠闲自得，十分快活。

文革前，除了晚饭后的散步闲聊以外，其他交往不多。文革中，我们是一个群众组织，我是头，他是成员，彼此接触和了解很多，70 年代末先后结婚成家，他恋爱过程的趣事我们都知道。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余老师带着他儿子住在经济办公室所里，我也没有房子，住在经济所大楼的洗澡间里。晚上经常去余老师那时聊天，相处得非常好。

余老师为人和善，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文革中打派仗，伤了感情，但余老师与两派的关系都非常好。比如，我们在文革中批判过董辅初，董在一个时期与我的关系就比较僵，但余老师与董的关系很好。我夫人 1979 年借调到经济所，当时政府规定，谁借调谁发工资，经济所政工组的负责人同意借调，但借调来以后，他不给工资，否则就回原单位。因董与该负责人的关系很好，我去董家求他说个情，不要我夫人回去，董一直未表态。我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回来，其心情可想而知。我夫人 10 个月有没有工薪，我一家四口靠我的 69 元工资生活，也不给老母亲寄生活费了。后来见了余老师，我向他诉说此事，余老师说，“你还不知道，老董就这么大个心眼（用大拇指卡着小指尖）！”。并劝我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余老师和大家的关系处得很好，确实有长者风范！这一点大家都体会到了。董爱才惜才，当我在学术上有了成绩，我们的关系也和好了。据经济所原来的人事处长告诉我，董还要他帮忙解决我夫人的调动问题。

再一件事。大家知道过去余老师研究什么吗？他从苏联回来，研究布哈林的经济思想。那个时候，主流经济都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一套，布哈林是被斯大林批判的，人们很少了解，余老师研究布哈林等人的经济思想，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一些争论，确实学了很多东西。

我再讲一件最近的事儿，余老师做事非常认真，这一点大家知道。比如，我写的《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 60 年》，有些章节的初稿我给余老师看，因为他很熟悉，给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和很多宝贵意见，上卷（1）出版后，我送余老师，上卷（2）出版大概余老师已经病了。余老师从头至尾看完后，挑出来 32 个错别字，一个一个在哪一页，写得清清楚楚。我很感动，不认真看书是挑不出来。我拿回去以后，都按余老师指出的改正了，并将余老师的这张勘误表（拿出让大家看）作为纪念保存了起来了。

余老师与人为善，帮助和保护同仁。上世纪 90 年代，樊纲、茅老师、刘军宁被点名批评，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重新查博士论文，看有没有所谓自由化，结果把樊纲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分给余老师，余老师不想随声附和，但是看后又没有完全把握，就来找我，他说，“他们搞这玩意，看来是要整人，要我重新审查，你说怎么办？给樊纲评语我怎么写？”我说，你就写樊纲的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综合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主进行综合的，不仅没有自由化的问题，而且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余老师就按这个口径给樊纲写了评语，樊纲的论文就过关了。问题在于当时的论文审查都要指导老师表态，樊纲的导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意见，所以余老师的评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余老师在所内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很大，这大家都看到了，我就不说了。回忆起与余老师共事的点点滴滴，的确令人深深怀念！他上次住院时，我曾给他夫人打电话问过病情。这次没有来得及去医院探视，他就走了，心里很抱愧！我们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了，在天则所合作的也很好。

我补充一句，余老师负责学术部是时间最长的。开始王立忠等等换了好几个，说明不是太安心做这个事情，以后都走了。怎么办？当时得找人，没有人管这个事儿是不是？我夫人提醒我余老师退休了，请他来。我觉得做学术这个事还得行家。余老师懂得这些，所以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从 1997 年到最后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踏踏实实做这个事情。

愿余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

[【返回目录】](#)

## 余大章先生 追思会纪要

[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部分员工于2018年9月3日在「余大章先生追思会」的发言纪要，主持：蒋豪]



2009年1月13日的年终总结会合影，前排左二为余大章先生

**蒋豪：**好，谢谢张老师。张老师恐怕是我们中间和余老共事最长的同事。

**陈威威：**余老好像天然具有一种品质，这个是后天学不来的。他天然的有那种把冲突和尖锐的东西淡化掉的性格，这真是一种骨子里带来的，学不来。就像刚才张老师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张老师的建议很奏效，但是我相信这主意他要不来问张老师，他不像这样能够出这个主意的那种人，太老实、敦厚的人。

余老师气质里面有一种天然的东西，你不可能往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里去联系。我想起很多年前去南普陀的佛学院看到的，两个院子的小门正对着，两个门上面各有两个字，一个门上写着“随缘”，对面的门上写的是“无我”。这四个字给余老师太合适了。他那种接纳他人的随缘，真是宽得像海一样；你怎么跟我观点不一样？你怎么会那样想问题？在余老师那儿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念，他的这种状态就是“无我”，这是“大家”才有的品性。但是好像你又很容易忽略余老师的这个素养，等这个人过世了，你才会发现这个特质了不得，你学不到的。你想学你学得了吗？反正我学不来，当然也想努力

学。我觉得太厉害了，这水能克钢能穿石，这就是余老师。余老师过 80，算喜丧了，大家不要那种哀怨怨的，按佛学对生命的讲究，过世的人在转世前意识还在，多数人过世后还会在挂念的人和环境里逗留，有些人过世会当即转世去了，如果余老师现在还没转世，现在应该就在这里，相信吗？我建议大家给余老师鼓个掌，你们同意吗？余老师就在这，就当信，鼓个掌吧！

**盛洪：**行，可以！

(会场掌声)

**蒋豪：**我觉得陈老师刚才说的，确实大家对余老的感觉应该是基本上都是差不太大，“随缘”、“无我”，这确实也很恰当。但是他却也在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年封咱们的天则网，包括这个社科院有关的部门找张老师，包括茅老都找了，但是好像没人找余老，这个挺有意思。这个确实是，这个您总结的“无我”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状态，不计名利，但是他又认认真真，同时他又是做出了很大成绩，卓有成效，确实是我觉得余老精神值得每个人去学习。

**赵农：**我说几句。我感觉在工作作风和为人处事方面，能够代表天则水准的，一个是茅老师，一个就是余老师。余老师既是学术部的负责人，也是经常和天则之外的人和机构打交道，应该说频率比较高的。他这个风范实在是太好了，语言、语气、声音、音调、音色，给人都是一种彬彬有礼、温暖、爱他人的这么一种阳光的色调。这个我也看在眼里，说实在我自己的修养方面的境界跟余老师距离还很大。

余老工作做事也非常仔细，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来不显摆自己。所以我感觉这真是可以称得上是高风亮节。虽然他故去了，不敢说别人，在我脑海里我相信余大章老师是永存的，存到我哪一天我也没了为止。我为身边有这么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好的同事、一个好的长辈，感到非常荣光、非常荣幸。正因为余老出色的工作成绩，以及优异的表现，连续三年被评为天则所的“最佳天则人”，最后第四次授予他“终身最佳天则人”的称号。我认为余老当之无愧。最后我说余大章先生千古，我永远怀念他，谢谢。

**蒋豪：**谢谢赵老师包含深情的缅怀。其实咱们每个人和余老接触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我个人觉得余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事也能做，小事也愿意做。学术部这个工作，虽然他先后也有几个助手，包括李冰老师、张林、潘进、刘倩。因为我以前在崇文门的时候，我天天去，余老基本天天去，所以天天见，但是我看到余老师不是今天命令这个，明天命令那个，能做的、他都自己做。他那个本子，现在还在我们这个抽屉里，包含那些学者的通讯方式。

他认认真真的给每一个学者打电话，有时候不知道的还找其他老师问，也找过我，希望我们双周要找谁，要准备物色什么人。这种品质，我觉得一个机构要成功，必须得有这样的人，不能都是有特别崇高的理论思想，但小事都不愿意做，余老在这一点上，确实特别让我感动。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到所里参观的时候，路过余老办公室的，一看怎么还有个这么老的先生在这认真的写东西，我介绍这是我们学术部的余老师，这可能是2016年的事，2017年余老慢慢的身体有点情况就不再上班了。还有高老师有时候爱和余老开玩笑，给余老请安半跪礼，余老每次也都是，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全弯下身来，也要做一个回礼的动作。

**陈威威：**你觉得余老师这种性情里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像什么？特别像狄更斯小说里的英国的那种普普通通的绅士，为人处事的那种风格。跟他这种风格形成对应的，跟余老师正好相反的，就是郑也夫教授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蒋豪：**挺好，您这个比喻。

**陈威威：**我觉得余老师那东西学不来。比如编这期要发在周刊上的讣告，我就打电话跟小胡商量，讣告的标题要不要显示余老师的名字？因为讣告里我修余老师的这张照片，然后底下是有说明文字的，但是在目录里，讣告标题里要不要出现余老师的名字？小胡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做合适。后来我就想，余老师是那种，事情我来做，但是“我”退后面去，他的那种低调不止于此，就是我可以做事，但是“我”不必出现。一想到这个，那就不加名字了，最后在目录里还是不出名字更像余老师一贯的风格。

**蒋豪：**对，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身体。但是余老师就像您说的他已经算高寿了，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要注意身体。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病有低龄化倾向。我的感觉现在虽然一方面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实际上青年人的风险并不见得减少，可能也许会更多，早逝的也很多，大家都要保重。请大家畅所欲言，反正都和余老师肯定是共事过。

**李冰：**我就先说两句。余老师这个事情很突然，觉得还是有些不太能接受。因为最早我劝过他早点去做手术，中期还给余老师打过电话，当然他没接，他夫人接的，说去他家去看一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看成。所以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没能在最后的时候看到。

来到所里之后，我主要跟余老师在一起。余老师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愿意聊天、瞎聊的那种人。可能经常看点网站，看点书什么的。也有过一两次相对正式一点的谈工作上的事。从总体上来说，余老师这个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与人为善。在整个社会上，每个人的追求和定位或者性格都不同。有的人

是慷慨激昂，有的人按鲁迅说的是脊梁，他不是。余老师给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就是，由那种向善之后阐发出来，自然流露的一种平和。在这个方面可能与他接触的人了解的更加深刻一些。

而且余老师整个对待事情的看法，相对比较能够考虑到不同的因素，同时也能更多的替别人着想。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余老师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具备的，这也是整个性格的原因所造成。余老对所做事情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可能想法不那么过于先锋或者是超前，但是比较认真，这种态度还是值得去学习的。所以，能够在余老师手下，是一种荣幸，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余老师对我来说，是个人修养很好的一个榜样，最后想说的是，余老师千古！我们怀念你！

**蒋豪：**谢谢李老师，我记得我每年就讲一点天则轶事，我讲过两个余老师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两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刚才李老师说的与人为善的幽默。张老师有一次大概可能是4月份，穿了个短袖，余老很会说话，说“您这么早就穿短袖，张老师身体真好”。我从屋里出来看他俩说话，余老师那天穿的实际上也是短袖。还有一次双周，是苏小和讲完请大家吃饭，我与余老坐一个桌，余老可能记得我是回族，上一个菜，他就说这菜是什么，过来一个菜，他先吃了一口然后说这是豆腐，意思就是给我介绍我可以吃的。后来我就夹了一筷子，后来我一尝不是豆腐，是龙利鱼。

**江湖：**那天刚刚听到余老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突然浮现起三年以前新年年会上余老和年轻人一起跳《小苹果》的画面，不知怎么突然那个画面是我第一反应想起来的，当时心里很难接受，很突然。虽然现在听陈老师讲余老也80多岁了，确实是喜丧，但是余老我觉得心理年龄并不是80多岁，何况天则的老师多数是长寿，因此我潜意识里面总觉得跟余老未来还有一起相处的时间，将来可以经常的看到他。

去年也是这时候，我离开的时候跟余老做了一次告别，就成为见到余老的最后一面了，因此一时间觉得还是有一点难以在情感上接受。我在平时的工作当中跟余老的主要的接触，就是中评网举办会议的时候，一些学者联系方式去跟余老问，每次我查来查去都查不到的学者的联系方式，就写一个纸条，上面写上名字，拿去请教余老，余老每次都是跟我说，你把这个纸条放在我这里，一会我告诉你。再过一会儿余老来找我，把这个纸条拿过来，上面清清楚楚的每个学者的名字后面，把他的邮箱和电话全都手写在后面，每次都是这样非常细致的给到我这里的。因此可见余老的工作的细致的态度。

另外一个余老师给我印象很深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印象里面天则双周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余老下到一楼，在那里等着学者来。绝大多数学者年龄都比余老小，甚至辈分都比余老差了，余老就是亲自到门口去迎接他们的到来。余老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温柔敦厚的长者的风范，对于年轻人和后辈总有一种润物无声式的关切在里头。我又想起来的一个小事情是，有一次我在所里面看书，余老走过来问我说，“江先生看什么书”？余老一看是推理小说，余老一翘大拇指，说：“好！锻炼脑筋”。

**陈威威：**太形象了，这就是余老师。

**江湖：**余老对年轻人的关怀以及敬业的态度，现在他突然就离开了我们，因此还是非常的难过。年初的时候陪女儿去看了一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那是一个商业片，主题给小孩子看也不会很深刻，但他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说，人死了并不是真的死了，只要世界上还活着的人里还有人记着他，他就还没有死去。年初看的这个片，本来早就忘了，但是余老一逝世，我就突然又想起那个片子了。我感觉有这么多人还记得余老，所以他一直还生存在我们周围。

**陈威威：**余老师性格里有一种很空灵的东西，就是很有佛性。

**蒋豪：**对，这是一种修养和智慧。

**陈威威：**他不是修来的，他天生就带来的。余老真是让你服了。

**钱璞：**大家说的余老师好多都是工作上的，还有对年轻人就都还记住余老师音容笑貌的。余老师特别好，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就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我刚进天则，我忘了是谁说的，余老师做公交车，当作锻炼，特别害怕别人给他让座，就有不服老，别人让座他就躲，不往那个座位前面去凑，很害怕别人把他当做一个老者对待，去照顾他。余老师身体好，穿得特别少，确实都是余老师平时这种挺鲜活的这样的一些形象。我记得也是刚来所里的时候，正好有喀什项目就跟着开始做，当时负责了其中一小部分的写作的工作。余老师还特别认真地去看了，还鼓励，那个时候也是刚到所里，余老师对于年轻人的这种鼓励，这种关怀，确实是挺感动的。余老师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儿，我觉得大家也都是记在心里的。

**杨华：**我觉得大家可能说的余老基本上也是我心目中的样子，确实余老师这种性格，他这种气质确实是有点儿学不来。可能是比较佛系。真是叫佛系。

有一次我记得跟余老聊天，那会他耳朵后来就不太灵了，就跟他说话不是特别多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特别大声也会吵到别人，但是小声他听不到。也是搬到崇文门以后，有一次我们俩都去得挺早的，当时也所里没人，后来就跟余老师聊了几句，就说他女儿的事儿。我就觉得他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的这种教育，表现出余老师不是那种教条的非得让儿女怎么样。他说他女儿当时嫁给外国人，他们老两口特别不同意，就不愿意他女儿自己出国留学，包括在国外就成婚，甚至当时我记得说是把户口本都给锁起来了，然后他女儿好像就是硬找到拿走。我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个情节。

他跟我说，说将来可不要让孩子出国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从这一点就表现出余老师，即使她女儿后来出国了，嫁给外国人这种执拗，余老师也没有说特别怪儿女、或者说决裂了、不认你了怎么样的，你这么反抗，但是余老师仍然还是很宽容，就在对待子女这种事，跟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都仍然是随缘。我觉得让我在这方面挺佩服余老师。人生在世，很多事余老师想的比较开，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比较钻牛角尖，包括我自己就觉得好多事为什么要那样，可能不会像余老师那么宽容去面对。觉得余老师还是活在我们心中，然后按余老师的精神和为人去要求自己。虽然说可能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还是尽量去以余老师为榜样。

**蒋豪**：好，谢谢杨华。

**杨华**：是，余老师后来慢慢的耳背，我就跟余老师说话就大声，是余老师因为他听不见，他得要大声，我才听得见。所以余老师那个气息丹田的跟我说话，说吓人一跳，我说你这么大声，而且很洪亮，像洪钟一样。

**陈威威**：他声音很洪亮。我当时也想余老师肯定长寿，因为声音能够聚气若洪钟的人都是长寿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耳聪目明是象征着生命的这个元气，但是耳朵失聪以后人的身体就会有症状了，但是他反差很大，声音有丹田之气但是耳背了，我当时还想这么洪亮的声音，当时我还想他一定会长寿。

**李婧**：我就简单说两句。余老师病的期间，咱们办公室正仁大厦和余老师住院的北京医院离得很近，我跟高老师就没有间断过，基本上一两周就去看望一次。余老师那会住院以后，他精神上还特别好，每天读书看报，就没间断过，我们每次去的时候说话声音还是很洪亮的，还特别热情，虽然在病床上，但是礼数都特别的周到，照顾你，你坐，你喝水什么的，精神很饱满，特别好。后来就搬到瑞新里那边，余老师还说等他身体好点了，要到所里去看看，收拾完后，我跟蒋老师去家里看望过一次。那个期间余老师体重稍微恢复一点了，有好转的迹象。过完春节余老师生日的时候，我跟焦阿姨又去家里看望了一下，夫人就说好像感冒了，从感冒以后就不愿意下楼，不愿意活动了，但是读书看报，外面的事情他都知道。每天就是早上第一件事就要看报。

后来就是住院，这段时间就没怎么去，就我自己去过一次，然后又跟高老师去过一次。最后去看余老师的时候，病床上他人是很清醒的，看到我跟高老师，离着很远，我们在门口，他在病床上，家里人跟他说来看你了，他睁开眼睛看我们，还跟我们打招呼，他知道是谁，脑子还是非常清楚的。家里人说直到他便血，就给上各种仪器，头一天早上起来还坚持看报、看书，上仪器以后，两只手都绑在病床上了，他特别的瘦了，血管特别怕破裂，就长期靠输营养液跟葡萄糖，两只手不让动了，就绑在床边。到

那天为止，他才不读书看报。要学习余老师这种精神，活到老学到老，从来没间断过。余老师对年轻人从来都是肯定、赞扬，从来没听他批评过谁，对年轻人也特别的照顾，不管谁对他提出请求帮助，余老师从来没拒绝过，而且特别耐心，告诉你这件事该怎么做，说的也特别细，特别周到。我就说这些。

**陈威威**：我说一下，这次周刊要发余老师照片，要修余老师图像。我把余老师照片修好了，感觉余老师在跟我笑，我不知道怎么就笑起来了。

后来我就想，其实人离开了以后，反而强化了对他的记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觉？我知道余老师去世以后，眼前老有余老师的样子，修照片的时候就感觉余老师就在我旁边，我坚信他就在那儿。

**焦大姐**：我跟余老师时间比较长了，虽然在工作上没有太多的接触，可是余老师为人特别平易近人，让人愿意跟他聊天。平常在所里，就觉得特喜欢跟余老师聊天，不管聊什么，他都特别的随和，他知道不知道的。最后一次和李婧上余老师家，他状况很不好，他说焦大姐，可能我太保守了，刚开始就应该做手术，可能就不会耽误了。刚开始老觉得保守治疗，别做手术了，他说现在都没体力了，恢复起来就比较难了。他老在自己开脱，后面余老师说没关系，做完手术以后就剩恢复了，现在有点感冒吃不下去，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

他老在安慰别人，意思就是说我很好了，不用那么惦记，而且还一直关心所里的事儿，连学者有些什么动向，去看他那么一会儿他都在问，都在了解。始终觉得天则所慢慢会好起来，他心里一直在装着天则所，觉得他虽然不上班了，可心里想的还是天则所。我觉得余老师的为人太让人留念他了，觉得不应该走的这么早，应该活得更长。他真的特别平易近人，愿意让人跟他接触。真的，我特怀念余老师。

**蒋豪**：余老的音容笑貌都保存在大家的记忆中。余老千古！ ❧

[【返回目录】](#)

## 颜昌海：没有中国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

[**颜昌海**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本文首发于 2017-04-12 作者博客，原题为《在铁的事实面前你还骂美国吗？》，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近日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国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

当告诉了他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 2.7 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 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

因为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但美国只是和加拿大做公平公正的买卖。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无奈。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国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经过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意识到过去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错怪了他们。

说起美国称霸世界，就不能不提美国第 5 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独立。

美国所谓称霸世界，却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 年卢安达爆发 80 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安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是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自由，并向中国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

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 13 所。所以，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曾国藩也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1758.4.28 - 1831.7.4] 油画肖像

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817-1825 第五任美国总统，独立革命时期最后一任总统，《联邦条例》制定者之一，  
门罗反对政党政治，尊重立法权独立，  
发表于 1823 年门罗任期内的一项反对欧洲国家对拉美扩张和控制权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声明，  
被誉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亦成为国际外交史上著名的“门罗主义”概念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 4 亿 5 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 3 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国。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 100 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任）、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分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画，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

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前中）、会办唐国安（前右）和范源濂（前左）合影；美国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生，培养出的人才个个如雷贯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也是由美国所退的部分庚子赔款的款项所设立



这支部队就是被中国百姓誉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以平民身份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飞虎队”和他们的战机，当时的官方名称是“美籍援华志愿大队”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

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 5 千万、1 亿、2 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 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国“抗日援中”。在 31 次空战中，以 5 至 20 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 217 架，自己仅损失了 14 架。5 名飞行员牺牲，1 名被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陈纳德将军 [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9.6—1958.7.27]

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美国“飞虎队”的创始人和飞行教官

当年（新华日报）是这样评价美国的——

**《新华日报》1943 年 7 月 4 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

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怜悯，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

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们认为，要没有中国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三个代表”芮成钢曾勇敢地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国钱”。很多人对中国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而是存款。中国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这是中国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中国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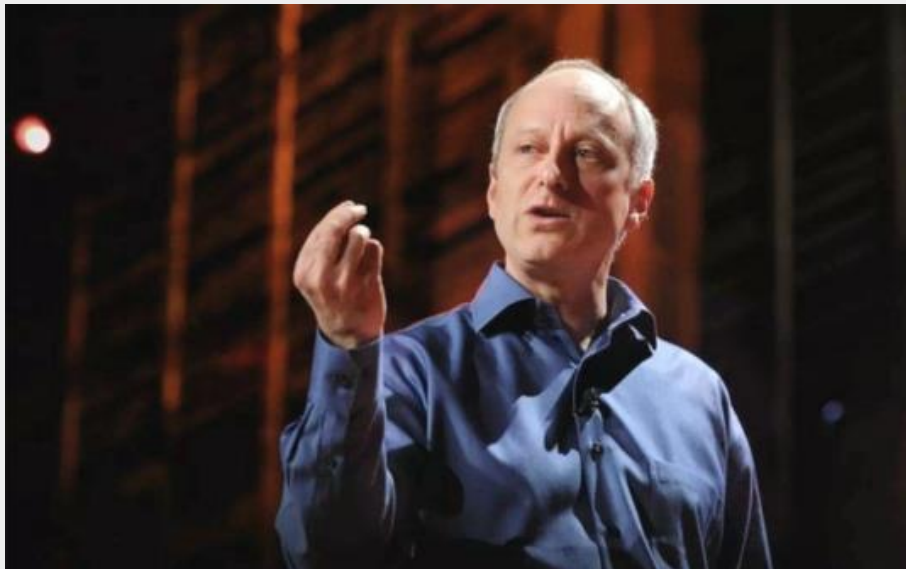
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利益集团的需要。

了解了真相后，在铁的事实面前，你还骂美国吗？！

[【返回目录】](#)

## 刘瑜：《公正》书评（虽然是书评，但是很现实，不看原书无所谓）

[刘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1-08-23《彭博商业周刊》，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J. Sandel], 1953 年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1982 年因所著《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XXX 这个蠢货”、“你吃 XXX 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 70% 甚至 90% 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 30% 甚至 10% 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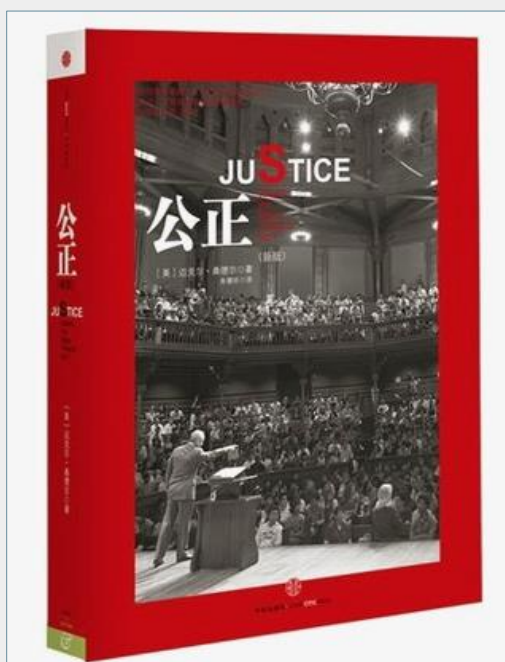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

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怎么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公正》 迈克尔·桑德尔 [Michael J. Sandel] 著，朱慧玲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出版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 100 万分给 100 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 100 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 100 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

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 1/4 甚至 1/2 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 AA 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 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

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 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原《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 3万元 (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 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 (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 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 (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 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 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 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 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 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 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 861581962310001 (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 [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 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 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 订阅 | 往期下载

---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信公众号: 云豹 ONE(ID:chinareview1)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